



爭取全民退休保障，反對當局以假塞責！

區議會選舉的特點和啟示

立即無條件釋放浦志強和所有無辜陷獄人士！

關於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規劃的評論

中國氣候惡夢

爭取全民退休保障，反對當局以假塞責！

振言

在香港市民普遍期望當局設立全民退休保障制度的要求下，港府在多年前委託香港大學榮休教授周永新博士組織團隊負責草擬有關計劃。周教授也樂於接受這項任命，全心全意地花了幾年的心血和時間，期間並與許多位學者專家交換意見，匯集多方許多珍貴經驗和學識，終於完成了全民老年金方案，建議港府採納實施。其要點是不設經濟審查，向年滿65歲或以上的長者每月發放3,230港元(根據2015年的水平計算)，約有112萬人受惠(截至今年6月計)；政府一次過注資500億元，並負責老年金每年一半支出，同時引入薪俸老年稅，僱主及僱員按僱員月薪1%至2.5%供款，月入供款上限12萬元。(周永新團隊再於本月22日調整其方案，建議政府一次過注資1,000億港元，並設立資產上限500萬港元，及設離境限制。)

而由政務司長林鄭月娥代表政府提出的「有經濟需要」模擬方案(政府研究方案)則是：在綜援和長者生活津貼之間建立多一層援助，向符合資產和入息條件的長者，每月發放3,230元(2015年水平)；單身長者資產不能多於80,000元，月入限額7,340元，長者夫婦的資產不能多於125,000元，月入限額11,830元，政府承擔所有開支，納稅人無須額外供款；估計目前約6成長者生活津貼受惠者符合資格，約25萬人受惠。(資料來源：退休保障諮詢文件，上述報道引自23日《蘋果日報》)

周永新教授建議的全民老年金方案，在退休保障諮詢文件中被指每年新增開支達479億元，是政府模擬方案10倍，更會導致大幅加稅。但原來政府把老年金方案三方面供款部份抽去，只計支出，結果錄得2064年高達23,950億元累積開支。周永新確認，若按照其原來方案計算供款收入，新增支出減半，未來25年也不用加稅。

政府企圖以製造周永新方案的天價開支來欺騙市民，企圖引起市民對大幅加稅的恐懼，從而製造支持和反對兩方面的矛盾和對立。林鄭月娥更公然詆毀周永新教授，說他對公共財政掌握不透徹，隨意講建議，研究不認真，以此抹黑周教授。如果鄭的評價成立，當局以前之委託周教授負責有關研究和提出全民退休保障方案建議，便是非常錯誤的決定。但事實全非如此。

這兩個方案一經公布，當局提出諮詢6個月，隨即被批評為假諮詢，引起民間團體的不滿，齊呼「不要假諮詢，還我真退保！」反對退休保障淪為翻版綜援的扶貧措施。更有180學者聯署決定杯葛假諮詢。

香港廣大民眾歷經幾十年的辛勞工作，到晚年退休，如果只剩8萬元的積蓄，那真是連棺材治喪費都不夠，晚年還要捱居住困難等生活痛苦，而政府財政年年大幅收入，如果不肯實施老年退休保障計劃，那就太無理了！

市民應該一致團結起來，共同努力爭取應得的全民退休保障，不能半途而廢！

2015年12月27日

十月評論
October Review

第42卷第2/3期（總第239期）
2015年12月31日出版

出版/編輯/承印：《十月評論》編輯委員會

通訊處：香港郵政總局信箱10144 號

Address: GPO Box 10144, Hong Kong

E-mail: octoberreview@gmail.com

Website: <http://www.october-review.org>

〔本刊一切具名文章，不一定代表編輯部立場〕

區議會選舉的特點和啟示 軍行

今年11月22日的第5屆區議會選舉，競爭非常激烈，投票人數和投票率都打破了香港區選的歷史紀錄，投票人數高達147萬人（其中有26萬人多數是年青人首投族）；投票率為47%，即幾乎近一半合資格港人前往投票，有幾個選區的投票率更達6成多。他們都投下難得的一票，自由表達了自己的意願，期望港人能夠實現當家作主。

這種發展是超出了特首和許多建制派人士的意料的。港人這次如此踴躍投票，反映出他們十分不滿現狀，特別是對特首的施政無能，加劇了廣大市民的生活困難和痛苦，比如樓價和房租連年不斷飆升，無數青年渴望購置物業成家都很困難，買了也負擔沉重；貧富懸殊加劇，不公平不平等情況日增；因而人心思變，要用自己手中的選票，選出好的議員，以期促進經濟發展，增加福利，改善民生，爭取民主權利。

競選結果：泛民主派總得議席比上屆多了3席，其中由民主黨分出來的新民主同盟15人參選，有14人獲勝，成績超卓；傘兵首次參選，即贏得了8席。建制派則比上屆所得議席少了3席，但仍穩居大多數，繼續在全港18個區佔據多數議席，保持主導地位；這是由於民建聯得到北京支撐，財雄勢大，能投入充足的選舉資源，又加上親京港報大力幫助宣傳，和大量社團的實際幫助。

今屆區選的主要特點是：選出的區議員有很多是新人戰勝了舊議員，特別是有名的民主派老將何俊仁、馮檢基，建制派的老將葉樹根、葛珮帆等舊議員，都競選連任失敗，被年青的對手取代，

這顯示出許多選民都要求新求變，以新人換舊人，期盼新被選者能夠專心全力做好地區工作。

傘兵能夠有8人當選，戰勝了一年多來因佔領行動而被建制派高呼定要『票債票償』的攻擊，以及特首之聲言要『Vote them out』（把他們趕走）。而新民主同盟和傘兵都打出『本土』主張，以維護港人利益為先，投票選出他們的選民並不排拒。這反映出香港的政治生態已有所變化。

而值得稱讚的，是工黨派出的殘疾人士葉榮勝出馬鞍山頌安選區，擊敗民建聯的立法會議員葛珮帆，証明殘疾人士也能得到街坊大力支持，贏得勝利，以後可為社會服務；連平機會主席周一嶽也對他當選感到『好開心』，証明殘疾人士也可以有好表現，希望葉榮能成為其他殘疾人士的好榜樣。

在區選結果公佈後，許多政黨以至香港政府和特首，都表示以後要吸收新生代青年，政黨要年輕化，政府的諮詢機構也要更多新生代工作等等，其結果將可能增加青年的話事權、影響力，提高其社會地位。

對於2016年立法會選舉的佈署，各政黨政團也要考慮派出較年輕的人員參選，以適應新時代的需要，這些都是此次區選所得的啟示。

2015年11月26日

怎樣不走老路

大進

十一月廿二日的區議會選舉塵埃落定後，無論支持民主人士抑或建制派，似乎都找到值得自己高興的地方：

支持民主人士

- 整體的投票率上升，創歷來新高，達 47.01%。正面的看法，就是經過去年的雨傘運動後，市民的公民意識進一步覺醒。

- 個別「政治素人、傘兵」攻下建制派的橋頭堡。把建制身兼立法會議員鍾樹根和葛佩帆拉下馬，是最為支持民主選民所津津樂道。

建制派

- 仍然主導區議會。在 18 區中，所有區議會都有超過一半的議席，是落入建制派手中。亦即是說，區議會建制派的力量沒絲毫受損。

- 建制派的年輕候選人，甚至是經驗淺嫩的，亦打敗傳統民主派的老將，左派工聯會 25 歲的陳穎欣擊敗馮檢基，民主黨元老何俊仁，亦保不了多年的基地。

這樣看來，是不是就大家拉平了？

毫無疑問，不管是支持爭取民主的人士，或建制派看來，大家都定會把這次交鋒，放回「後雨傘運動」的脈絡中來看。

佔中由2013年開始討論，到2014年，中央的連番高壓政治舉措，將積壓多年的民憤引爆，而催淚彈最後催生了佔領運動。事態的演變，客觀地說明了，一切「固有」爭取民主的渠道和模式都無望了，要使用體制外的方法來解決。當然，79日的抗爭未能帶來成果，接著來的問題便是：還可怎麼辦？

徹底失望的抗爭者，相信已經放棄。但部分不甘心的民眾，希望仍能殺出一條血路。

大家都清楚，區議會不是攪政策的地方，改變不了香港的大方向。所以抗爭再回歸體制內的戰場，其實是令人唏噓。不過，無論是傳統泛民政黨，以至較激進的本土團體，都樂於參與這次競選。

如果撇除陰謀論，參選是為了「銕票」（但意圖難以証實），或者本著寸土必爭的原則，跟建制派週旋到底；爭取當上區議員，較具體的正面得益，只是取得較多資源和知名度。

不過，區議會注重實務，要宣揚理念並不容易。區選前民主黨首先揭露屋村「鉛水污染」，事件理應是對他們有利。但選舉結果顯示，受「鉛水」影響嚴重的啟德北（啟晴）區選民，仍是較大比數（超過50%）投票給建制派候選人。要在政治意識普遍保守的群眾間「深耕細作」，並不容易，亦難以預計取得甚麼成果。

所以參與區議會，目標應是工具性。這次是練兵之餘、試試群眾的水溫外，亦應有再進一步的部署和較長遠的計劃。「再」在體制內只發發聲，替市民解決個別民生問題，不可以是終極目標。明顯地，政府會樂於給反對派「花瓶」角色，作為渲泄不滿。梁振英政府在區選後，向奪得議席的青年人伸出「友誼」之手，並透過官員，邀請獲選青年加入政府委員會，便甚有招安意味。

剛過去的區議會選舉，可算是一場前哨戰。明年的立法會選舉，肯定才是一場硬仗。各個民主政黨、公民團體都磨拳擦掌拭目以待。但如果他們能順利勝出，「再」走進議會後，是否又「再」只是爭位置、爭發聲權，甚至拉布，又「再」重覆幾十年來的抗爭模式？這次可以怎麼不一樣？因此，若策略只求重返議會（雖然這條戰線不應放棄），而沒有議會以外的抗爭策略配合，前景不叫人樂觀。

「後雨傘運動」、「後政改」時期，要發動像佔領時的大規模群眾運動是渺茫的，究竟前路尚可怎樣走？不同的意見都提了出來，好像：撐傘落區、社區民主化、爭取重啟政改、修改基本法、公民約章、爭取公投制度、港獨....。提出各個策略的政團，對時勢有不同的判斷，沒有形成共識。

在去中心化的抗爭形勢下，怎樣才能令各個反對力量，產生協同效應，足以跟政府和建制派抗衡，確是一個難題。

不少市民抗爭的心仍在。旺角清場後，鳩鳴團依然示威，佔領周年的金鐘，仍見大批市民；在各個生活領域，市民亦敢於怒吼：反水貨客、港大副校事件、香港球迷「怒噓」國歌，家長群起反對TSA、大批公眾反對「網絡23條」..... 但怎樣才能不止於情緒發洩，而是能積累為改變制度的能量呢？是值得去思考。

應立即取消小三全港性系統評估，讓學童健康快樂地成長！

涓滴

香港教育局局長吳克儉提出要小學三年級學生操練全港性系統評估 (TSA)，激發起學生家長的普遍而強烈的反對。他們認為，小學生平日上課留校時間已經很長，功課已經很多，要溫習做功課，往往要做到晚上十點，次日又要清晨起床趕返學校。而全日制已在全港小學推行，很多學校都把原有的一小時午膳時間縮為半小時，以致學童連咬碎食物時間都沒有，從而會引致消化不良，損害兒童的健康。如果再加上TSA操練，勢將是百上加斤，連應有的運動和休息時間都沒有，將會妨礙兒童的健康成長。教育的作用和本是要栽培出德智體三者都可完善發展的人材，而絕不是要培養出呆頭呆腦的書獃(呆)子的。但今天當局要實施的TSA，恰恰是會教育出書獃子的。這充分顯示TSA是對學童充滿高風險，絕不是像政府官僚和政客般「學者」所輕描淡寫說低風險的。這項措施實在是「學校教育惡法23條」！

為此，多個團體曾在立法會外舉辦「還孩子的快樂童年，不要小三TSA」的集會，許多家長又發起舉辦研討會，並邀吳克儉出席，但他卻要赴日外遊離港，又以「私人理由」再次拒絕出席，這反映他自知理虧不敢面對公眾爭辯，且着重個人享樂而不理當前重要公務。

立法會教育事務委員會為這個問題舉辦公聽會，共有80名家長參加，吳克儉又拒絕出席，改由署理教育局長楊潤雄出席，他也承認TSA出現了問題，要加以研究。

嗣後，吳克儉終於在12月3日宣稱，檢討TSA委員會將圍繞三個範疇，包括TSA深淺與題型、是否每年進行及是否全港學生都要參與，最快明年1月底前交建議。對於委員會建議會否包括取消或暫緩TSA，吳無正面回應。教育局宣稱，若未從減少操練及完善TSA方法着手，便一刀切取消TSA，未免太倉促。

吳克儉只應允作「重大檢討」，而不包括取消，他只提出隔年才考，以期收到「暫緩」的效果，但這仍是遠不能滿足大眾期望的。

15年來，香港政府大力構建一種學校質素監控及審核機制，現在的TSA就是這個機制的其中一個有機組件。在教育局這個機制和提出TSA的影響和壓力下，據12月13日 <<明報>> 報道：有小學為了學生「贏在起跑線」，以跳級授課推快學習進程，以高於一年級的課本授課。有家長表示，學校因急著教書跳過不少課題，或為着學生自修略過的內容，迫使家長在家中追趕進度。除了名校，有私校和地區上較佳的津貼小學亦加入跳級授課，惟家長選校時難以掌握全面資料，最終收到書單才可揭曉。有退休校長直指此現象畸形，擔心學校只著重學習成效，未有顧及學生需要。

這種做法使教育局想採取緩兵之計，繼10月底向學校發出新的家課與測驗指引後，於12月11日進一步向全港小學校監及校長發信，要求遏止小學操練問題；包括必須立即取消在課後及假期的TSA補課或模擬測考、不應要求學生特別是初小生補課、不要購買操練式TSA補充練習、針對有需要學生的課後輔導只能自願參與等。而據《明報》轉述教協調查顯示，近九成半小學校長對教育局指引感憤怒或不滿，吳克儉在出席學界活動後補充指，希望針對性與學校合作，以行政方式遏止操練解決問題，否則無論有沒有TSA，社會將繼續受過度操練纏擾。但這些都應歸根於教育當局構建學校質素監控及審議機制這一「教育23條」，以及最近提出TSA的錯誤所引致，吳克儉及其領導的教育局難辭其咎。如教育局將來強行實施惡法23條等措施(包括TSA)，教師則可停止評卷甚至罷教，學生也可罷考以至罷課。唯有立即宣佈取消TSA，才能解決當前的困局！

2015年12月13日

評「特首超然地位」和「未去殖民化」論調 微波

最近，一些京官對香港問題發出了議論，引起港人很大的迴響。

首先是中聯辦主任張曉明說：行政長官具有超然於行政立法司法三個機關之上的特殊地位。

這個說法難免被解讀為：特首是超越過或凌駕於三權之上，不受香港固有「行政、立法、司法」三權約束的。

張曉明的上述說法如含有這種意義，那是與<<基本法>>的有關規定相矛盾、相違反的。<<基本法>>第47條列明，特首要向終審法院首席法官申報財產，記錄在案。第52條列明，特首如果兩次拒簽重要法案，但立法會仍以三分之二議員通過法案，則特首必須辭職。第73條規定：立法會三分一議員可因特首瀆職或嚴重違法向他提出彈劾動議，再由三分二議員通過，就可報請中央政府免除特首職務。此外，特首涉嫌有貪污行為，廉政公署也可立案調查以至交法院審訊的。

上述這些引文和規定都表明：在香港的法律面前，人人是平等的，即使是特首，也要受法律制衡、約束，無權超越法律之上。張曉明的意見，可能反映出內地官員可以凌駕於法律之上、不受法律約束、黨領導司法等意識，企圖造成特首在中央之下、港人之上的特權地位，培植他成為中央的最忠心地方官。而特首梁振英也認為，他是中央任命，因此引伸出或意味行政長官的地位是超然的。

為此，香港大律師公會特發表聲明，指張曉明先生「以『超然於三個機關之上』描述行政長官的特殊法律地位，難免被解讀為特首凌駕於三權之上，引起公眾焦慮，本會對此深表遺憾。」同時要求他加以澄清，但他一直未予理會。

前任終審法院首席法官李國能對此重申：「法治和司法獨立是香港在一國兩制之下的核心價值，是我們社會的基石，大家都保持高度警惕。」

「在法治之下，任何人，不論他的地位有多高，都不能凌駕於法律之上。」

現任終院首席法官馬道立也響應李國能的言論，強調<<基本法>>規定香港奉行司法獨立，人人在法律面前平等。

張曉明9月12日的言論，在香港人中會頓時產生不良反應，這多少反映在香港大學於9月9日至17日進行的民意調查結果中：港人對本港以至一國兩制前途的信心全面下跌，當中對本港前途的信心更跌至2003年沙士後新低，對一國兩制的信心亦跌至低於五成，由3個月前的49%跌至44%，其中18至29歲的組別更有67%表示對一國兩制無信心(引自9月23日<<蘋果日報>>的報道)。

接著，別號「左王」的全國港澳研究會會長陳佐洱又發表講話，批評香港經濟發展緩慢，未依法「去殖民化」，反而「反中國化」死灰復燃，氣焰囂張，導致香港內耗嚴重，問題叢生。

陳佐洱指責香港人未去殖民化，是對於香港民間出現「去中國化」的思潮和表現企圖加以阻遏以便走向中國化。其實，港人並不喜愛再受殖民主義者或者獨裁者的專制統治，而希望自治，以便自由地生活、工作，命運自主。香港經過殖民地時代傳承下來的許多事物、制度，例如法治制度、廉政公署等，都不應在「去殖民化」的要求下加以廢除，而應保存及完善的。這樣並不表示是迷戀殖民統治。要求港人向中國化，首先就應該清除自身的官僚主義和特權享受，全國能實行民主政治，人民能享有民主自由權利，包括選舉及罷免各級行政人員等權利。古語有云，正人先正己，如果大陸當權者不「先正己」，則人民是無法心悅誠服，而是要追求徹底改革的。

「左王」對港人的上述指責，是否預示出京官之趨向於收緊對港政策，更少兩制化而加強一國化，這且待事態的進一步發展來証實吧！

06/11/2015

國際大都會

陳中禧

孩子姑姑說

兄宿外國千民鎮

兒女終身被天困

大山小河小村涓涓滴滴無所事事

回流名珠頂峰

染寶氣看天下之遼闊

山脈人情連連綿綿

村姑漁夫遷遷遷

香水古龍奶粉傳媒廉政WIFI足球NBA

飛越香煙醇酒美人跑馬影畫收規

高官明星巨賈三合會

不是一般眉來眼去

到處摩到天頂，深入地府的層樓

排排坐好，豪宅公屋割房橋底

有錢無錢一宿

兩餐

出賣上帝為咩？

火車軌軌轉不如電車長路漫漫

汽船標緻不及空調大巴小巴紅巴綠巴直通巴

私車專車泥頭貨櫃

無懼熱氣寒流颱風黑雨白雨

搗山掠水

新婆婆十通二十達

必有一款啱你揀

購物朝朝來潮

泊來貴嘢揀中環

古董舊思，創意源源

談笑間千萬交易

花園街鴨寮城

天光或天黑

十來廿蚊有價講

必有一款啱你揀

擾夜星清夢

耆老被裸著候洗澡

虐待幼童，七歲十五公斤

父親毒死親子自殺

洋漢往涼亭上吊

咁誰的事業線

遙距在胸前

健美造美還美真美假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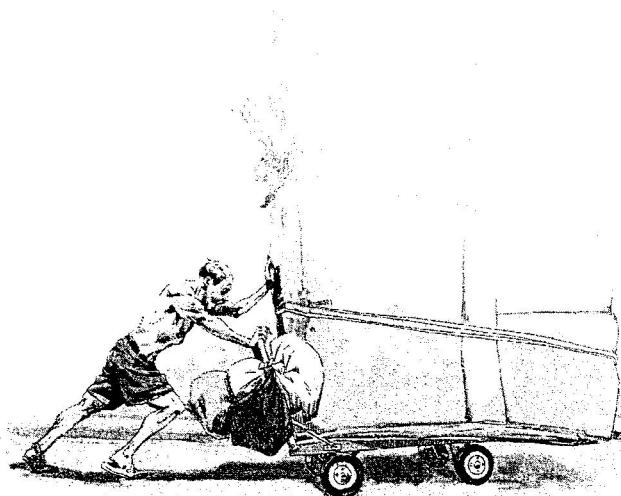
日日稱神

電視票票票

票指十優超班女

並實不想揀

13/9/2015



看似溫柔的暴力最可怕(轉載)

陳德章

由前年雞蛋掙中財政司司長曾俊華，到經過一段長時間的法律程序，再到昨天我已刑滿出獄，案件算是告一段落，但抗爭之路卻是剛剛開始。三星期的監禁相比一些政治犯確是一個不算長的刑期，對我個人來說是一個難得可貴的挑戰，更是一個抗爭路上很好的體驗和磨煉。在獄中每天清晨起來打掃監倉、清潔廁所再到車衣廠剪線頭等工作，這雖然都是勞動性的工作，但也是難得的機會讓我個人沉澱和反思。經過這一段經歷，我更清楚和肯定的告訴大家，這三星期的監禁並沒有嚇怕或讓我倒下，反而讓我更堅定於自己一直堅守的信念，為了香港有一個更公平、正義、人性化的社會保障和政治制度，我會繼續在這條反抗道路上努力，盡自己所能付出的力量繼續推動社會改變。

在過去三周被囚禁的日子裏，特區政府的司局級官員頻頻發表言論，看似是希望推動政改「普選」方案，又或如曾俊華司長所說的「興建」，但這些言論實際效果卻是不斷地激化矛盾，製造二元對立，絲毫無助改變現時局面。在監獄中，我所能接收的資訊多是排山倒海的批評民主派否決政改方案就是千古罪人、又或是林鄭司長批評激進派行為暴力的陳腔濫調，但言論的主軸就是希望將社會矛盾激化的責任推卸到一班沒有實質權力的人身上。而主流媒體亦往往將我等無權者的反抗與暴力連結起來，如林鄭司長遇到反對聲音就譴責社民連及一眾示威者粗暴，又或曾俊華司長先後批評「雞蛋抗高牆」和立法會拉布是破壞和拖延，這所有言論都是不負責任、諉過於人的無恥行為，絕非是當權者應有的言論態度。二

元對立的局面絕非站在雞蛋一方的人民所造成，無可否認，議會拉布、狙擊行動甚至掙雞蛋等直接行動或許某程度上是一種小暴力，未必能為所有人接受和理解，但試問相比起政權的麻木不仁和制度的暴力，我們的反抗只是制度暴力下的必然後果，所有責任都在當權者身上。

市民可能覺得曾俊華司長在不同的公開場合和網誌的言論都很幽默，但試想一位當權的司長看到種種的社會問題依然不為所動，這還有幽默的餘地嗎？曾司長眼見制度的暴力，而其本人亦擁有權力但卻不為活在人間煉獄的老百姓做些好事，這何嘗不是一種更可怕的「溫柔」暴力呢？對於曾司長最近的言論，該罵的都罵了，我只能再一次強調，我們一直爭取的全民退休保障和全民普選制度都是大眾的福祉，是真正化解曾司長口中二元對立的制度。我們都不是一群如當權者口中喜歡使用暴力的壞分子，如果當權者能認真正視社會現況和民意，我們的反抗或特區政府口中的「暴力」才會停止，否則我們的反抗只會繼續，甚至只會不斷升級，而這一切責任都應由當權者負上！

後記：感激所有送上祝福慰問的民主同路人，我昨日已出獄，我會繼續不亢不卑，重回工作崗位，為全民退休保障和全民普選制度的目標繼續努力！

立即無條件釋放浦志強和所有無辜陷獄人士！

張開

轟動世界備受矚目的維權律師浦志強，去年五月在朋友家參加六四25週年研討會後被公安逮捕，在黑獄中拘押長達19個月，然後以涉嫌「煽動民族仇恨」和「尋釁滋事」兩罪被起訴，證據是在微博批評官員及政策的7條言論，審訊3小時即擇日宣判，浦志強在庭上沒有認罪。這再次顯示當局的以言入罪，剝奪人民應有的言論自由權利。

浦志強理應獲無罪立即無條件釋放的，19個月的關押已經是很長的受夠苦了。現在，在強大的國際和國內大批維權律師要求釋放的壓力下，法院終於宣判他有期徒刑3年和緩刑3年，胡志強已表示不上訴了。但他仍未得到無條件釋放，今後3年內仍可藉口因他違規而把他重投黑獄的。

另一以言入罪的著名記者高瑜，被扣上「為境外非法提供國家機密」的莫須有罪名，重判7年監禁，在黑獄中飽受折磨，以年逾七十的古稀之年，又確實患有嚴重疾病，後由指定醫院出示證明文件，獲減刑兩年至5年，予以監外執行，仍未得到無條件恢復自由。

至於起草《零八憲章》的維權人士、諾貝爾得主劉曉波，於2009年聖誕節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被判囚11年，至今多年在獄中受盡苦難，其妻劉霞也被軟禁而無自由，不能與外界聯絡。劉曉波也應該早日獲得釋放。

舊的冤案還未得到合理解決，新的冤案又不斷湧現。一位廣東維權人士郭飛雄，最初被捕控以「聚眾擾亂公共場所秩序罪」，但法院認為他同時構成「尋釁滋事」，兩罪罪成，判囚6年。這完全是無辜的！法院的濫加罪名，暴露出法院主事者純粹是為當局全力服務的忠僕！

習近平在統領黨政軍司法等所有大權後，即收緊黨外黨內的應有民主權利，並在歷時14個月重修《中國共產黨紀律處分條例》後，於日前經由中共中央發佈，明令嚴禁言論自由、新聞自由，首先以「妄議中央和自治區黨委重大工作方針罪名的《新疆日報》社黨委書記、總編輯、副社長趙新尉被開除黨籍、公職並立

案審查。同時，新疆自治區紀委也對自治區扶貧辦原黨委書記、主任趙國明以嚴重違反政治紀律，在重大問題上違背自治區黨委的決策決議而「亂說」立案審查（11月3日《明報》）。

另一明報專訊報道，據中紀委喉舌披露，華東某市公安局副局長因在微信朋友圈內擅自轉發關於「一國兩制」的文章並自發評論，被指違反了新頒布的《中國共產黨紀律處分條例》中有關「妄議中央大政方針」的政治紀律，受到處分。

還有許多事例舉不勝舉，所有的新事例都再次暴露中共黨內只有集中而沒有民主，違反了列寧所主張的民主集中制原則。

在黨外，言論自由更是越收越緊，網民若在微信及微博等社交平台發佈「虛假」消息，即屬觸犯刑事，最高可判監7年，從而以言論入罪，構成「文字獄」冤案。例如敢言網絡評論家信力建無辜被扣查。

而且，打擊範圍廣，甚至包括香港。例如：《亞洲週刊》前資深評論員王健民，編輯馮中校，因在港出版政論刊物《新維月刊》、《臉譜》，被內地控以「非法經營罪」羈押一年半後，現在被起訴，王健民又被加控「行賄」和「串通投標」兩宗罪，顯示當局要把王送進監獄。

香港晨鐘書局老闆姚文田因出版眾多中共負面情況的書，去年被深圳當局以「走私化工原料罪」重判10年。這些事例都顯示中共不能容忍香港的新聞自由，要直接出手打擊，以言入罪，封殺言論自由。（以上報道同見11月5日《蘋果日報》）這更是公然違反《基本法》有關香港居民享有言論、出版自由的明文規定的。

正因為這樣，使去年「無國界記者」所發佈的2014年度報告指出，中國依然是全球囚禁記者和網絡媒體人最多的國家。最近有另一國際組織又評定中國是2015年囚禁記者最多的國家。

以上的最新事例，又一次表露出中共的一黨官僚專政的橫蠻無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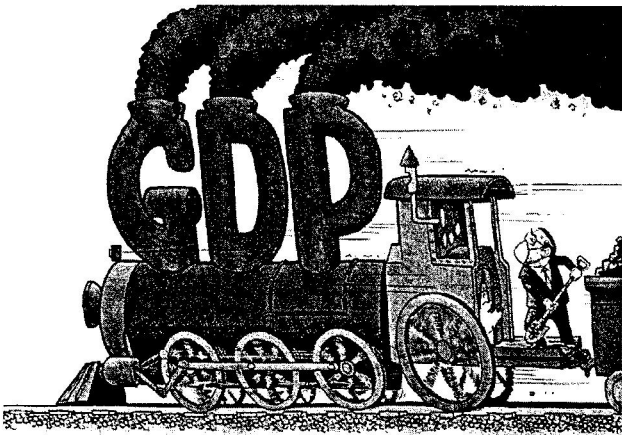
2015年12月22日

關於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規劃的評論 張開

中共中央第18屆5中全會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13個5年規劃的建議>>(以下簡稱<<建議>>),其中規劃的主要目標是:到2020年,全國國內生產總值和城鄉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現時農村的7千萬貧窮人口,全部脫貧。

為達到這個目標,<<建議>>規定今後5年的經濟保持中高速增長,國內生產總值年均增長底線為6.5%,到2020年,比2010年翻一番。

不過,中國經濟的發展,近幾年已經逐漸「下行」(減速)了,它要受國內外許多因素的影響、制約;日本、俄國、巴西等國近年的經濟已經衰退,中國也有可能到2020年連6.5%的目標也達不到,若然,小康社會的願景也可能難以實現了。



五大發展理念

全會<<建議>>首次提出未來5大發展理念是:堅持創新、協調、綠色(生態)、開放、共享5方面的發展。

「創新」理念是指制度、科技、文化等方面的創新。

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最艱巨最繁重的任務和關鍵是在農村。要堅持協調發展,「加強薄弱領域中增強發展後勁,就必須着手推動城鄉協調發展,健全城鄉發展一體化機制體制,推動城鎮公共服務向農村延伸,提高農村建設新水平。長期以來,中共的政策總是犧牲農村、農民的利益,盡量多榨取,少給予,以致農業發展緩慢。現在提出要協調發展,國家未來的公共財政,便應向農村、向貧困地區更多傾斜,公共資源的配置要更多向農村傾斜。這些都必需當局有具體政策措加以落實,否則便可能流於畫餅充饑。

在全會落幕後,中共中央即發出有關<<公報>>(以下稱<<公報>>),提出其中要堅持綠色發展,走出生態良好的文明發展道路,推進美麗中國建設,給出了許多手段和工具,比如加快建設主體功能區,發揮主體功能區作為國土空間開發保護基礎制度的作用,實行省以下環保機構監察執法垂直管理制度等。

綠色中國理念可能會如空中樓閣

習近平在《說明》中宣稱:「生態環境特別是大氣、水、土壤污染嚴重,已成為建立小康社會的突出短板。扭轉環境惡化、提高環境質量,是廣大人民群眾的熱切期盼,是「十三五」時期必須高度重視並切實推進的一項重要工作。」「現行環保體制存在四個突出問題:一是難以落實對地方政府及相關部門的監督責任,二是難以解決地方保護主義對環保監測監察執法的干預……。」

為什麼中共和中央政府「難以落實」對地方政府等的監督責任呢?這主要是由於中共久已實行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導致各級官員幹部在享有特權後,更加貪污腐化,唯利是圖,中共和中

央政府的政令難以下達，「上有政策、下有對策」的情況久已流傳，這次不過是出自總書記之口而已。

但是，在五中全會提出「十三五規劃」把生態環境改善列為未來五年重點目標，聲稱要實行「最嚴的環保措施」之後，中國第一大淡水湖江西鄱陽湖畔居民，因抗議當地政府引進化工廠致環境嚴重污染，(11月3日)有近萬居民遊行示威，卻遭防暴警察用警棍、催淚彈鎮壓，防暴警甚至罕有地使用防暴槍、以橡膠子彈對示威者直射，致多人中槍受傷，傷者彈痕纍纍。江西當局的做法，無疑給幾日前提出綠色中國的中共五中全會抹黑(詳見11月5日《蘋果日報》報道)。這也再一次暴露出地方官為繼續保持他們與污染環境的化工廠生產商的私利，或明或暗地運用手中權力為非作歹，加劇環境污染。化工廠等資方不顧環保公益，任意排放毒氣造成空氣污染，使民眾吸入；或把有毒的廢水傾倒於河流，造成水污染，危害飲水的民眾健康；或灌入境內泥土中，造成稻菜等污染，毒害民眾。但地方當局卻完全懶理，不執行中央政府的決策措施。公報提出要「實行省以下環保機構監測監察執法垂直管理制度」，看來也難以貫徹落實。本月2日的<<文匯報>>大字標題是「霾沒京城，晝如夜，市民直呼：眼辣鼻癢嗓子疼」，污染度逼近倫敦1952年的奪命大煙霧，北京、天津、河北等十餘個北方省市紛紛中了霾伏，可見PM2.5濃度的嚴重。



共享發展成果理念可能會如鏡花水月

《公報》提出的第5個理念是「共享」發展的成果，將中國五大民生問題統一納入，並提出具體目標和時間路線圖，體現中央推動共享的決心。但正如國家行政學院教授、中國行政體制改革研究會副會長汪玉凱所斷言的：「未來確保五級政府層層落實該理念和政策才最為關鍵。」言外之意應該是：五級政府是難望會「層層落實」的。

汪玉凱指出：「過去中國改革發展成就很大，但最大的問題是改革成果沒有被全民所共享，造成嚴重的貧富差距、行業差距、地區差距，引發大量的社會矛盾和衝突。可以說過去的發展沒有讓公平正義普照到所有中國民眾身上，財富不斷向少數人手中集中。」他說，從政府和社會看，財富過多向政府集中；從勞資關係來看，財富過多地向資方集中；從普通行業和壟斷行業來看，財富過多地向壟斷行業集中。「這三個財富流向的極不合理導致貧富差距加大，社會矛盾尖銳，老百姓對政府主持公平正義的社會政策產生懷疑，而所有這些問題都可以追溯到『能不能讓發展成果改革成果讓全民共享』這個主題上來。」

在中國30多年來實行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基礎上，上述的「財富極不合理流向」正是資本主義發展的規律必然發展的結果，這是不以某些人的主觀願望來徹底改變的。要有效矯正這些「流向不合理」的發展模式，唯有在真正社會主義以至共產主義制度的基礎上，才能夠做到各盡所能、各取所值以至各取所需的合理公平分配的理想。而中國今天以至可見將來的資本主義制度，是無法「有效」地做到的。

公報同時提出一些改良措施，企圖解決社會公平性的問題，這些措施如果能夠全部落實，對民眾將會有些幫助，但恐怕負責分配等的人員會

從中謀利，巧取豪奪，削減民眾應得的利益，這些都是頗有可能的。

公報還提出，“推進健康中國建設，深化醫藥衛生體制改革，理順藥品價格，實行醫療、醫保、醫藥聯動，建立覆蓋城鄉的基本醫療衛生制度和現代醫院管理制度”。

但即使中國當前的城鄉醫保已基本實現全覆蓋，卻水平頗低，質量不高，使得如何建設一個高質量高水平的醫保體系，仍是中國在未來實施中亟待解決的問題。

實施兩孩政策

公報又提出，全面實施一對夫婦可生育兩個孩子政策，積極開展應對人口老齡化行動。

中共在1980年嚴厲執行獨生子女政策，一對夫婦只准生育一孩，當時最可怕的是到處懸着的大字橫幅：「打出來，墮出來，滾出來，就是不能生下來。」還有「寧添十座墳，不添一個人」，「上吊給一繩，喝毒藥給一瓶」等「涼血」標語。村官嚴厲執行只生一孩的規定。超生的民眾會被重重罰款，當地村官也會被罰。

根據《2010中國衛生統計年鑑》統計，自1980年代中國強制一孩政策至2009年，人工流產宗數已累積至2.75億宗。高者一年1400萬宗，低者則維持每年600多萬宗。

地方為了計生達標，不惜將孕婦由生子之路送上死路。2009年，山東聊城有一懷胎9個月的高齡產婦竟被十多名計生幹部合力強行流產，最後母子雙亡。

同年，湖南瀏陽市亦有個案因被強制流產，母子同赴黃泉。

2012年，陝西懷有7個月身孕的馮建梅因交不起萬元罰款，被當局冒險進行流產，足以生得出的嬰兒變成死嬰躺在母旁，慘無人道。(引自

今年11月3日<<明報>>刊漫大新聞系新聞學高級講師呂秉權的文章)。慘絕人寰的事例實在舉不勝舉。

35年來，中央當局只准人民生育一孩，為此犧牲了無數人的幸福甚至生命；現在為了要增加勞動力，應付生產需要，並減輕人口老齡化的負擔，卻要人民多生一孩。國務院也跟着批准這個決定，明令全國執行，而人民卻仍然無權自行決定可以在兩孩之外，再多生一孩，為的是已生的兩孩如果都是兩女孩或男孩，便想再生一男孩或一女孩，但一直都無權由自己決定，國家搶奪去人民應有的生育權。這也是中共無數專制橫蠻措施之一。

綜觀規劃的內容和理念，其中有的會遇到困難重重，更多的則難以做到；這些改善措施雖然可能稍勝於無，但仍遠未能滿足人民大眾的民主要求的。

2015年11月29日



“超級低俗屠夫”吳淦特輯

劉山青輯撰



慶安事件

國內的報章在這段時期其實是最關注另一件案件，黑龍江慶安火車站，一名民警在眾目睽睽之下，槍殺了一名討飯者，其時受害人的老母和3名小孩在身旁。事件引起了國內的廣泛同情。吳淦在受捕前，正全力參與聲援慶安事件。

在這段時間，內地網絡對吳淦群起攻擊。這些攻擊包括：

2011年2月10日，吳淦在安徽蚌埠與朋友喝酒時，被當地的東升派出所帶走。

2012年4月，福州市晉安區政府對王莊地區進行征地拆遷。吳淦買來一個全裸女性人體模特，把一位女幹部的頭像“安裝”上去，並在模特身上、大腿上寫上惡意攻擊的語言。

經過民警訓誡，吳淦等人才停止了準備抬著模特遊街等惡劣行徑。

談及吳淦的家庭，村民大多搖頭。他父親徐某某是上門女婿，母親在他14歲時病逝；1998年，他父親因組織一幫人打砸養雞場，並圍攻前去處置的民警，被判處有期徒刑3年，又因在服刑期間越獄增加刑期1年；他哥哥在2006年以代加工半成品為由，夥同他人騙取貸款71萬餘元後潛逃，目前還是公安機關網上追逃對象。

廈門航空港安檢護衛部一位姓王的工作人說“吳淦是在辦公室工作，幹些打雜的事。”吳淦另一位姓唐的前同事介紹，“他能說會道，喜歡發牢騷。”談起吳淦時，這兩位前同事的評價差不多：在公司內網上寫過一篇所謂的長篇小說，但很低俗；平時工作吊兒郎當，幾次差點到了被開除的地步。

2007年他辭職走了，原因不明。吳淦的前妻是他中學同學，1998年結婚。法院的一份民事判決書顯示：“經常不回家”“2002年發現他有外遇”，前妻要與他離婚，後經雙方親戚勸阻和好。2006年，吳淦提出與前妻離婚，並簽署了離婚協議，其中一項是夫妻的共同房產歸吳淦，吳淦支付前妻25萬元。後來，吳淦以60萬元的

《人民日報》在5月25日刊登了一個案件，這件案件很小，一名號稱“超級低俗屠夫”的網民吳淦，因“聲援”一宗法院判決，被分別決定行政拘留五日、合併執行行政拘留十日處罰。

據報導指，吳淦在「5月19日上午9時許再次來到法院門口，繼續高聲辱罵該院負責人，並擺放事先製作好的帶有侮辱性質的看板，準備在法院門口擺設靈堂。」江西省高級人民法院工作人員報警。

這一宗不起眼的案件引來了國內媒體的鋪天蓋地的報導。

《人民日報》在5月25日刊登數千字文章報導。中央電視臺《朝聞天下》不惜耗時達5分30秒，新聞直播。《人民日報》在2天後再次以「揭開超級低俗屠夫真面目」為題，以2千多字，報導吳淦案件。

律師反駁

劉四新律師對央視報導撰文駁斥。他表示：

一、捏造事實。

央視報導污蔑吳淦自稱律師，報導中根本看不到吳淦自稱律師。

二、央視掐頭去尾，把吳淦的合法公民抗議行為誣蔑為“鬧事”。

三、妄稱吳淦和蒙冤者家屬“引來大量群眾圍觀，一度造成法院通道出入困難”。

價錢把房子賣了，帶著孩子和錢去了廣西陽朔，把當時無工作也無住所的前妻拋在了廈門。後來法院缺席判決了他們的離婚案。

據公安機關介紹，吳淦曾因偽造證件、無證駕駛和擾亂公共秩序，先後3次被公安機關行政拘留。

吳淦其人

吳淦在其網誌的自我介紹則為：

@屠夫小的時候，因為不愛讀書，家裡條件還不錯，被父親送到福州精武館習武，那時身手敏捷，花拳繡腿學了不少。

@由於89那年的事，90年秋季又招了一批兵，我當兵第一年就當了班長，自己還是娃娃兵。

@17歲就被老爸送到部隊，當時老爸部隊關係很好，老哥16歲去當兵，在家邊上當兵，我找了廈門機場邊防這個流氓兵當。

@從部隊直接轉入地方，戶口，工作，房子全解決，當時來說是一個非常不错的好事：

@當時在地方工作也挺賣命的，領導蠻喜歡我這個李蓮英：

@當兵不到兩年由於改制，機場安檢從邊防移交給地方，於是我和另外十三戰友到地方來組建安檢新部門，轉入機場工作。

@在機場邊防，整天和上班無異，一百多個兵，一百多個官，整天被幹部帶去偷雞摸狗，倒機票，賣介紹信，走私香煙，敲詐勒索，吃喝玩樂，壞事做盡。

@由於家族親戚很多都在從商，被他們影響，上班之餘開始琢磨下海，跟他們投資加油站，被老爸拉去開食品加工廠，自己搞小餐廳，糧油店等等，其它賺了，和老爸搞得虧了。

@上班混日子，下班燈紅酒綠，每天應酬，面對各種不喜歡的人，老家整天有人找我幫忙（出入境），加上和孩子媽媽的矛盾，決定換種自由的生活，於是辭職賣掉房子，帶上女兒開始

流浪。

@和女兒還有兩個洋妞朋友逛了大半個中國，女兒說喜歡陽朔，於是就在陽朔隱居，陽朔呆煩了就出去溜達旅行。

@白天遊山玩水，夜晚在西街酒吧喝自帶的威士忌和雪茄，和以前生活的朋友基本斷掉，終於可以按自己意願選擇朋友和生活

08年下半年，由於保姆家裡出事，於是我自己照顧女兒，每天下午她上學去，我就到咖啡廳裡上網，接觸了該死的互聯網和貓眼論壇，瞭解地震豆腐渣，毒奶粉，還有艾未未調查死亡兒童的事情，給我觸動很大，於是開始寫文章，09年出來殺豬。

屠夫愛找茶！最近對品種，品質，發貨速度，店員做了調整，服務更上一層，品質更上一樓，歡迎大家惠顧，也可以幫大家找茶，因為這裏茶城有一千多家批發商在經營，各類茶都有。

@道德家們說屠夫，你怎麼賣茶？你應該要不食人間煙火，你這是在賣革命牌茶葉。五毛說，屠夫你這是在行騙。我說你妹的，又要牛不吃草又要牛產奶，這事找你去，我做不到，哈哈！屠夫愛找茶新茶上市

(筆者按，屠夫為了糊口，真的在淘寶網上賣茶，但又被別人借此攻擊。)

站在街頭拿出喇叭，大聲吶喊，這種嚮往自由的行動是一種天然的追求！

為善

吳淦除了飲酒作樂，壞事做盡，作網上推手參與社會性事件外，還有支持慈善事業。

江西「樂平冤案」

吳淦的被拘的直接起因是支持這件案件。據“中國維權律師關注組”的報導，江西「樂平冤案」律師雨中堅守17天

江西「樂平冤案」是2000年5月江西樂平縣一件兇殺案，4名被告稱遭刑訊逼供認罪，被判死刑，後改判死緩，在後減至重刑。2011年11月，另一案件的嫌疑人被捕後，供認對樂平縣兇殺案負責，但檢方始終沒有對樂平案作出撤訴。今年5月上旬，再有張凱、王飛等4位委託律師依法到江西高院要求閱卷，但該院卻一再拒絕律師閱卷，逼迫律師在江西省高院門前堅守多日，以爭取獲得針對樂平冤案的合法閱卷權利。

吳淦關注的政治事件

吳淦除了關注黑龍江慶安的徐純合事件；江西樂平冤案，還為任自元、秦永敏募款、為李旺陽簽名；追究山東德州受賄官員案；發出[英皇主席楊受成被爆性賄賂大陸高官]文章。

在夏俊峰案中，他寫道：@一個雖然貧窮，但很幸福的家庭，因為城管的暴力，就這樣整天愁雲滿臉，整天以淚洗面。

鄧玉嬌案

鄧玉嬌是一服務員。2009年5月10日，湖北省巴東縣野三關鎮的數名政府官員到雄風賓館休閒中心夢幻城消費，其間三位官員要求服務員鄧玉嬌提供「特殊服務」。鄧玉嬌不甘受辱，三位官員惱羞成怒之下便試圖強姦。在糾纏中，鄧玉嬌抓起水果刀，刺傷2人。其中1人搶救無效死亡。鄧玉嬌最後被判免予刑事處罰。

“鄧玉嬌”事件案發後，吳淦以線民身份前往湖北巴東，第一個在病房見到鄧玉嬌並拍照上網，發動線民關注鄧玉嬌案，並為其募捐。

在數年後，吳淦「到湖北巴東辦所裡一個案子，順便給鄧玉嬌的繼父（她媽媽電話已換掉）打給電話問候，問了鄧近況，告知鄧已嫁人，生了一個男孩，快兩歲了，她繼父說我如果到野三關要請我吃飯，我說免了，等你哪天沒顧慮，我再讓你請，他尷尬的笑了笑。」（約於2015年，筆者按）

屠夫為何行文？

屠夫雖是大老粗，但也會寫文章。他寫了
十月評論 2015年第2/3期

殺豬寶典和飲茶寶典。《環球時報》在2015-05-29選文「網路輿論推手線下滋事被抓，冤嗎？」。文章指：「吳淦寫過“殺豬寶典”“喝茶寶典”“拆遷寶典”等文章，向其他激烈的線民傳授經驗。……

但在2015-07-03被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等兩罪正式逮捕。」

殺豬寶典

吳淦表示，「這幾年接觸了許多訪民，也有一些訪民向我求助」，寫了“殺豬寶典”。

他總結：

- 1: 信訪制度是國家用來騙人民和制衡地方政府的一種工具。
- 2: 上訪信訪，就如兒子犯錯，你找它爸爸爺爺，他們當然會保護自己的兒子。
- 3: 上訪信訪風險性極高，你可能被截訪，被關黑監獄，被拘留判刑勞教，被自殺，被強姦，被侮辱，被軟禁等等，可能還會累及家人。所以上訪是一條不歸路。
- 4: 司法不公的根源在於這制度，個人面對這個制度是無能為力的，不作惡已經算仁慈了。
- 5: 千萬不要相信北京的各種所謂什麼都能搞得的能人，律師，記者等，騙子最多的在北京。
- 6: 用自殺、自焚、下跪、傷害自己，和傷害無辜百姓方式來解決問題是最愚蠢的方式。

吳淦的建議方法為：

- 1: 要抓住重點，不要在一些無謂的問題上糾纏。
- 2: 司法程式途徑如果走到盡頭走不通的時候，不要再走上訪這條老路，在這國度，你要面對現實。
- 3: 在各種司法管道走不通的時候，冤有頭債有主，找給你製造冤案的人。
- 4: 針對一個單位和部門永遠比針對領導個人來的笨和無效，因為你針對一個機器，誰也沒責任，誰都不害怕。
- 5: 充分利用互聯網成本低傳播快的特點。網路上一定要遵循實事求是，不能誇大造謠的原則。
- 6: 各種行為藝術、惡搞、抗議、罷免、申請作惡官員財產公示、舉報控告、各種資訊公開、

聯名等等，要懂得用別的案子來揭露它們，不單單停留在自己的訴求，要注意一點，不要被抓住把柄，以免被它們做文章迫害。

7: 儘量不要把路走死，適當的妥協也是需要的，在恰當時機做出恰當選擇。

8: 線下多參與本地和相鄰地區訪民、網友的交流和飯醉，團結才有力量，要大家同心，有事一起圍觀吶喊。多多參與各種社會事件圍觀，認識更多志同道合朋友，認識多了人，自然管道和力量就多。

喝茶寶典

吳淦在5月19日被請進派出所行政拘留時，可能尚以為可以用他創立的喝茶寶典胡混過關。他應該想不到被改控十分嚴厲的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在喝茶寶典中，他表示：

在喝茶前你要做好以下3點：

- 1: 你確認你所做的事情是你所能承擔的。
- 2: 你在做那些公民權利爭取時，一定要做到陽光，公開，正義。
- 3: 你是否做好了你如果失去自由後資訊發佈的管道。

喝茶中要注意的事項：

- 1: 不卑不亢，不要上當被激怒。
- 2: 只說你自己的部分，別人的儘量裝糊塗。
- 3: 告訴他們自己所從事的事情是光明磊落，陽光的。
- 4: 儘量不要和他們個人結下個人恩怨。
- 5: 儘量不要去侮辱他們人格。
- 6: 如果個人結下私仇，原始血親正義復仇我個人不反對。
- 7: 千萬不能相信他們的話，更不要試圖去說服他們。
- 8: 決不決定寫保證書是根據你自己情況而定，有時為了結束無謂的糾纏，可以寫。
- 9: 介入公共事務，最好是異地介入，避免地方利益引起的不必要麻煩。
- 10: 他們有時會找你單位、家人、朋友，所以你儘量讓你身邊的人知道你在做什麼。
- 11: 很多時候他們會挑撥你所聲援的人，這個一定要注意不要上當。

成為公民的道路上，你不是在喝茶，就是即將要去喝茶的路上，每個人都不怕喝茶了，都把喝茶當成一種榮光，這社會就進步了。

鬥爭策略

屠夫有自己的行事策略。吳淦以「屠夫一些廢話」為題發表。

文章表示：「最近因同城聚餐、要求官員財產公示、爭取教育平等權等原因被抓的朋友有十幾位。」

「同城聚餐我非常贊同，因為以前我也一直在做，我也積極參與，也從中牽線搭橋促成一些地方形成氛圍。但我不認可去冠名和讓人誤解有泛組織化行為，這是我基於對流氓集團本質的瞭解和對風險的認識」，當然我敬「和一些對土共還抱有希望的朋友說一聲，土共只有騙你們上當的份，你別想騙土共，別以為用哄、捧、騙、表明是“一家人”就能讓土共跟著你走，就能騙過它，別噁心。」

「正確的態度有且只有一種，那就是清晰表達且踐行政治反對。」

被捕前的日子

吳淦的網誌寫至27個星期前，即約於5月15日，他被抓的前數天。在這星期裏，他寫了：

@屠夫: 最近觀察一陣子，發現一下子微信上，一些海外的人突然多起來舞，一些垃圾群、垃圾人、是非處儘量遠離。別試圖去交流和辯論，沒用的。

@這兩天在外面，沒有無線，手機、微信、翻牆都出現故障，好不容易爬上來。

@昨晚遭受強密度網路電話攻擊，估計上百個，王八蛋們真的被我弄疼了，真的對我恨之入骨。這幾天，微信，短信，手機，郵箱超負荷了。

@吳淦(超級低俗屠夫): 感謝兩個北京網友過來幫我整理資料，在上島咖啡開個小包廂，我也忙裡偷閒躺一會兒，困壞了，兩三點都有電話短信。

吳淦案件之發展

吳淦在行政拘留後，原本星期五(29/5)期滿釋放，但星期三(27/5)被福建警方以尋釁滋事及誹謗罪，轉為刑事拘留。

吳淦的辯護律師於7月3日得到電話通知，廈門市檢察院已經以尋釁滋事和煽動顛覆國家政權兩項罪名批准對屠夫吳淦的逮捕。

吳淦被捕後，紐約時報中國網在6月1日曾報導此案，文章可能解釋了為何共產黨這樣重視吳淦們。

文章表示：「共產黨把注意力放在了一種新型活動人士身上：背後沒有特別的組織、平臺或網路，但頗受社會歡迎的個人。以前，被關押的政治活動人士劉曉波和藝術家艾未未等知名的個人也曾受到過類似抨擊，但是針對草根階層的很少。這些人在中國支持者眾，但外國對他們知之甚少。」

BBC網在7月3日也有報導此事，文章討論了維權運動中網絡推手的角色，「吳淦所參與的維權，往往屬於矛盾更加尖銳、侵權行為更加突出的那一部分。在2012年之後，維權和抗爭在政治上已經合為一體，吳淦也因此處於抗爭的前列。」

禍延家屬

在這段時間，中共抓了他的爸爸。多年以前，吳淦的父親與人合夥辦了家小企業。2013年初，屠夫的父親因職務侵佔罪被刑事拘留了七個月，後取保候審將近兩年。

6月25日，公安通知他爸爸去辦理撤案手續。但在晚上公安又刑拘他爸爸，羈押在看守所。其量刑可以在三個月拘役至一年有期徒刑。

吳淦案件的社會意義

5月14日《人民網—中國共產黨新聞網》高調報導《習近平關於全面依法治國論述摘編》一書正式出版。

「近些年來，中國社會矛盾尖銳，上訪民眾越來越多，其中農民最多。而引起民眾上訪的普遍性問題通常為土地禁用、房屋強遷等。-----民怨由此，要實現阻止“不鬧不解決”現象蔓延的目標。」

5月22日，明報京港台報導，「近千上訪者向習近平“拜年”全被羈留或驅趕」。

維權網報導，從7月10日周五開始全國進行「大抓捕」維權人士。在兩天內共涉及81人，其中6人遭刑事拘留、1人遭監視居住、28人遭扣押未獲釋、46人獲准回家。

習近平在今次的瘋狂拘捕維權人士，跡近鄧小平在25年前的全國打壓民刊運動。

西單民主牆事件

習近平的中國夢、一路一帶等觸動很多社會利益。官搶民地和化工污染項目成為當前的主要對立。舊的冤案尚未解決，新的冤案不斷而來，令維權活動受到民間支持。

5月29日《人民網評》的「超級低俗屠夫 被刑拘為誰敲響警鐘」說得很白。文章警告，「吳淦被刑拘為很多人敲響了警鐘。顯然，吳淦被刑拘不是終點，鐵的事實、威嚴的法律讓那些利用網路胡作非為的“吳淦們”明白事情的嚴重性質，算盡機關太聰明，到頭必定是法律的嚴懲。」

後記

吳淦出身於部隊，本是共產黨羽下的既得利益者。他因為看到了社會的不幸，走上了維權的道路。他不是律師，很難受到傳媒關注。吳淦在其文章中表示：「西單四君子出事的時候，第二天我就去看看守所看他們，我就是冀希望這樣能让更多人關注和意識到問題嚴重，無奈他們不夠知名，關注度不夠，我個人比較關注那些知名度不夠而付出很多的朋友，他們更需要關注和幫助，不論從精神上還是物質上支持。我不希望等到核心的人出事大家才關注核心人物，然後罵別人聲援不力，不跟著自己關注。」

他很小心謹慎，之前只被抓了3次行政拘留。但，今次事件可能令他長期陷獄。由於沒有人為他列傳。筆者希望借此為他鳴冤，希望在他日出獄之後，能夠閱讀這一檔案。

不忘愛因斯坦的告誡

破謎

著名科學家愛因斯坦曾經告誡世人：“不要過於高估科學與科學方法；我們切莫以為，對於影響社會組織的問題，只有專家有權表達他們的看法。”

不要過於高估科學

索爾克生物研究所教授大衛舒伯特(Dave Schubert)在美國主流媒體CNN發表了論證嚴密、引證文獻豐富的文章:《科學領域的論戰影響到世人健康》，挑戰了轉基因“商用科學家”和推銷團隊關於轉基因食品安全性的謊言。舒伯特教授指出:

大多數玉米和大豆在美國是轉基因的，用以抗孟山都研發的“農達”除草劑。“農達”是由混合的化學製劑組成，包括主要成分“草甘膦”以及“表面活性劑”(“表面活性劑”使得草甘膦得以有效地穿透進入植物內部)。因此，這種噴灑在作物上的除草劑並不如我們對於一般意義上的農藥所理解的那樣 ---- 它是無法洗掉的。自從轉基因植物被發明出來，“農達”的使用量已經增加了10倍。美國環保局提升了草甘膦在食物中被允許的含量，目前，它已經被發現出現在人類血液中。.....

法國科學家沙拉里尼在《食品與化學毒理學》發表的研究顯示：使用農達的轉基因玉米以及這種除草劑本身，增加了實驗鼠的癌症發生率。正如所有揭示轉基因植物對健康潛在危險的出版物一樣，這一篇論文引發了來自從事植物生物技術科學家們即刻的、惡意的批評，直到導致雜誌編輯近期撤回論文的決定，抹去了科學文庫裡一項重要的研究記錄。更為嚴重的是：撤回論文這一事件，被用來進一步推廣轉基因食品 ---- 誤導公眾不信任一個支持對於轉基因食品安全性疑慮的研究。.....

孟山都自己曾在8年前用同樣數目、同樣品系的實驗鼠在同樣這本雜誌上發表過一個相類似的研究。只是孟山都的研究只有90天，聲稱轉基因食品對實驗鼠沒有傷害。與孟山都發表的研究之區別只在於：沙拉里尼的研究時間跨度為兩年，而直到實驗持續到9個月(270天)之後，實驗鼠才發生腫瘤。因此，顯而易見的是：孟山都短期的90天餵養實驗，是不足以探測到直至9個月以上才會發生的致癌效應的。---- 這種低劑量地暴露於環境毒素，是需要一定長度的時間積累，才會顯示對於健康的危害。比如，最近美聯社的一個報導，記錄了阿根廷在種植了轉基因大豆10年以上的地區，發生了急劇增加的癌症以及新生兒出生缺陷。.....

我確信，已經存在極其重要的證據表明(就像沙拉里尼研究所揭示的)---- 一些轉基因食品對人類健康是危險的。為了能讓支援這方面研究的科學實驗資料進入公共論述的領域，科學家們必須置科學倫理的責任於商業公司的利潤之上，停止對於轉基因安全性方面的科學研究之持續性的打壓。捍衛科學家之權利發表他們的科學發現而不受科學外因素的審查或打擊報復(曹明華譯) 1

另一方面，北京大學科學史和科學哲學教授劉華傑從眾多科技案例中總結出，科學專案從來就包含著政治、經濟、社會等因素，轉基因絕不僅僅是科學問題，更是政治問題。消除科學的負面影響，比科學本身的成本更高。2

¹ 刊于《聖地牙哥聯合論壇報》 2014年1月9日
http://blog.sina.cn/dpool/blog/s/blog_6188d2520102eh0b.html

² 劉華傑, “轉基因作物, 該聽誰的?”, 2015-12-29,
<http://www.shiwuzq.com/food/knowledge/gm/20151229/3031.html>

劉華傑從一個一般原理“技術成本非對稱原理”來討論GMO的風險與責任。所謂“技術成本非對稱原理”是指：研發並實施去除技術A的效應E之B技術所需的支出，要遠大於當初研發與實施技術A的支出，表現為針對效應E兩種技術A和B的成本不對稱。³

這一原理與熱力學第二定律的熵增加原理有關。舉例：把一滴墨水釋放到一個水池中或把一瓶農藥釋放到小河中非常容易，但是想把釋放出的東西聚集起來、回收起來卻相當困難，即增熵容易減熵難。某流域採用一系列技術增加了沿岸居民的經濟收入，但是此過程污染了河水，而如今試圖讓河水清澈起來需要的新技術（包括社會技術）非常複雜，支出巨大。⁴

再舉例：研發和生產AK47的收益是明確的，是少數人得利，受害的或者感受到威脅的是大多數人，然而想去除AK47的影響或者限制其濫用的花費十分巨大。即使世界上不再生產這種步槍，其技術也可能稍加變化而應用到其他殺人武器當中。世界上各國研發核武器都有相當的支出，但是比起限制核武器以及消毀核武器的難度、花銷以及時間，原來那些支出簡直可以忽略不計。也就是說，去除核武器的影響並預防核武器將來的可能災難而導致的支出，將遠大於當初研發核武器的支出。⁵

劉華傑根據上述“技術成本非對稱原理”總結：即使有主體願意研發B技術來試圖消除A技術的後果，B技術的成本也遠大於A技術的成本。關鍵問題是：是否要提前認真討論其風險，明確誰是最大受益者，誰是潛在的風險承擔者，以及控制風險可能的支出。⁶

前車可鑒

全球最大的轉基因種子公司和農藥公司孟山都曾經在越戰時期為美國空軍大量提供生化武器（落葉劑，又名橙劑），以破壞越南軍隊在叢林中的埋伏點，導致大量越南和美國軍人後代嚴重畸形。

在全球糧食生產格局中，轉基因乃跨國農業公司盈利的工具，每一分錢都建立在農民的

無助、絕望甚至生命之上。自1995年以來，印度自殺的農民已超過30萬，平均每天都有41個印度農民自殺。美國導演米查·普雷德（Micha X. Peled）拍攝紀錄片“苦澀的種子”，以一個立志當記者的女孩曼殊（Manjusha Ambarwar）及一位農民拉姆（Ram Krishna Kopulwar）為主角，紀錄印度被哄騙種植基因改造種子的棉農的悲傷故事。⁷

2002年，印度維達巴（Vidarbha）地區特蘭塔克裡（TelungTakli）村莊農民聽信了孟山都對神奇種子的虛假宣傳，開始種植Bt轉基因棉種。十幾年來，不斷有農民因為每年繳納的種子權益金和不斷上漲的化肥農藥投入，向銀行、高利貸借款，最後因為收不抵支，走上破產之路。他們失去了賴以為生的土地，甚至被迫選擇自殺結束無望的人生。而當他們覺醒，希望重新依靠傳統棉種時，卻發現市面上已經買不到了。⁸

致力保障小農生存的九種基金會（Navdanya Foundation）著名科學家席娃博士（Dr. Vandana Shiva）批評像孟山都等跨國糧農企業橫行霸道背後都有政府大力資助：“農業工業化的設計，不論是種子、化學藥品、機械，都是成本大於產出的農業，之所以在美國行的通，是因為大型農場可以拿到補貼。”⁹

中國淪落孟山都垃圾場

中國農業大學長期接受孟山都巨額資助，涉嫌利益輸送。華中農業大學涉嫌惡意推廣轉基因水稻，長期幕後組織所謂轉基因大米品嚐會，導致湖北、湖南等地轉基因水稻種植失去控制，而身為轉基因監管機構的農業部卻涉嫌行政不作為。¹⁰

2015年12月16日，美國農業部頒發關於阿

⁷ 林睿好，“苦澀的轉基因種子”，2015-12-06，環境通訊網，

<http://www.shiwuzq.com/food/knowledge/gm/20151206/2923.html>

⁸ 同上。

⁹ 同上。

¹⁰

<http://www.shiwuzq.com/food/rights/science/2015/1204/2912.html>

³ 同上。

⁴ 同上。

⁵ 同上。

⁶ 同上。

根廷轉基因農業的年度報告公文，確認轉基因食品作物依靠中國農業部批准進口消費而苟存，原文明明白白地說：阿根廷之所以搞相關轉基因作物的商業化種植，是因為中國方面批准了轉基因食品的進口和消費。

美國農業部2015年10月頒佈的統計說，2014/15 農業年度，中國的大豆產量是12.35MMT (百萬公噸)、進口為78,350KMT (公斤公噸)；2015/16農業年度，中國大豆產量降低到11.50MMT、進口增加到80,500KMT。

中國中央農業工作組官員陳錫文等宣稱進口轉基因大豆“不可避免”、根據過去數年年度增長比例估計，大約2018/20年前後，中國進口轉基因大豆數量將可達到100MMT)。

美國農業部公文和孟山都公司公文都清楚說明，相關轉基因作物實行商業化種植，是依靠中國農業部批准進口才做的。換言之，搞轉基因食品作物垃圾的對象是中國。10多年前，美國學界就說明轉基因食品作物是“垃圾技術”、能否成為“黃金技術”取決於中國印度等亞洲發展中國家的消費。¹¹

切莫以為只有專家有權表達影響社會組織的問題

2013年至2015年全球許多國家舉行“反孟山都遊行”，呼籲公眾關注轉基因食品對人的危害。5月24日，全球再次爆發400萬人反孟山都的遊行。



¹¹ "美國農業部確認：轉基因食品之所以苟存，靠的是中國！"，2015-12-29，人民食物主權，<http://www.shiwuzq.com/food/knowledge/gm/20151229/3029.html>

十月評論 2015年第2/3期

北京市民楊曉陸、李香珍、田香萍三位代表狀告農業部隱瞞轉基因產品毒害真相，要求公開被告批准孟山都公司草甘膦除草劑“農達”進入中國市場、對其頒發“安全證書”所依據的毒理學動物試驗報告。獲得北京市第三中級人民法院正式立案。第三中級人民法院建議追加孟山都公司為當事人，2015年11月16日正式開庭。

2015年3月，世界衛生組織國際癌症研究中心(IARC) 11個國家17位專家對草甘膦農藥致癌性審查評估，將草甘膦重新評級為“對人類可能的致癌物”。新華網等媒體詳細揭露孟山都公司轉基因種子捆綁草甘膦危害人類的確鑿證據。¹²

2015年11月30日，台灣立法院教育委員會初審部分《學校衛生法》修改案，針對第23條第一項、增加“禁止使用含轉基因生鮮食材及初級加工品”等文字。換言之，若法案三讀通過，未來高中（含）以下中小學的營養午餐，不得使用基因改造的生鮮食材及初級加工品，例如轉基因玉米粒、轉基因豆腐、轉基因豆干、轉基因豆皮、轉基因豆漿等。唯獨大豆沙拉油、醬油因屬於高階加工品，不在禁止範圍內。¹³在臺灣，2015年初修訂之《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將於2016年實施，含大於3%基因改造原料的食品未來都須予以標記，但在歐盟，只要超過0.9%就必須注明。



¹² 佟屏亞，"北京市民狀告農業部串通孟山都轉基因16日開庭"，2015-11-16，來源：烏有之鄉，<http://www.wyxxwk.com/e/DoPrint/?classid=24&id=354830>

¹³ "臺灣反轉大勝利：轉基因玉米、豆腐退出校園餐桌"，2015-12-04，<http://www.shiwuzq.com/food/knowledge/gm/20151204/2918.html>

中國氣候惡夢：氣候變化的最大製造國正自食污染惡果 抵抗(中國勞工論壇)

正值12月聯合國巴黎氣候峰會正步入尾聲，中國受到新一輪的霧霾來襲，多個城市首次啟動「紅色警告」，令中國資本處於癱瘓狀態。北京有一半的私家車沒有開動，學校被下令停課，建築工地和一些工廠被下令停工。地方居民及污染專家批評政府反應緩慢——污染水平比上週「橙色警告」時更高，但當局的相應措施卻更少。

中國傳媒報道，毒霧侵襲超過3億人，東北部另外27個城市也提高了污染警報。二氧化碳排放是全球暖化的主因，也是巴黎峰會的焦點。雖然不時侵襲北京等城市的霧霾雖然並不同於二氧化碳排放，但也是來自同一源頭：煤炭和石化燃料。雖然中國經濟衰退，煤佔中國能源輸出超過六成，而中國嚴重依賴煤的趨勢將會在未來幾十年繼續，除非發生基進——革命性——的方向改變。

北京的空氣質量(AQI)指數發出紅色警報，是基於有毒的空氣微粒(PM2.5)超過600，毒性接近機場的吸煙室。世界衛生組織的安全水平是25，但幾乎沒有一個中國城市接近這個水平。去年，74個主要城市中只有3個達到較寬鬆的官方AQI目標，但全部都超過世衛的安全標準。在2008-15年期間，北京平均每日的AQI達到100，是世衛標準的4倍。北京市長早前說道，目前北京不是宜居之都。但這城市卻不入全中國十大污染城市(去年北京排行13)。

電動車

三週以來霧霾侵襲三次，交通和經濟被中斷，中國媒體報道北京居民對電動車的興趣大增。過去五年，中國在綠色及可再生能源的投資比任何國家更多，包括為深圳比亞迪汽車製造商提供寬減稅項和政府資助等優惠措施。但這些投資對環境帶來的好處卻被經濟制度和「市場方案」的現實所抵消。即使充電設施和電池容量不足等問題得以解決，電動車的電力還是主要由燒煤等石化燃料提供的。

幾十年來爆炸性的經濟增長造成大量浪費和破壞環境，意味著自2000年以來世界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增長中有三分之二來自中國。最近政府修正中國千禧年代的耗煤量數字，結果發現二氧化碳排放量比之前紀錄的數字多出10億噸。

氣候威脅

由於依賴石化燃料來驅動經濟，中國成為停止全球走向氣候災難的一大阻礙。所謂氣候災難是指在本世紀末全球平均溫度上升兩度。以下一些事實突顯了問題的嚴重性：

- 中國的煤炭(最污染的石化燃油)產量和耗量幾乎是全球其他國家加起來的一半。
- 在2006年，中國超越美國成為最大的溫室氣體排放國——去年中國的排放量比歐盟和美國加起上更多。

但中國也是最受氣候變化威脅的國家。在巴黎峰會開始前，官方專家發表了一份900頁的報告，突顯了這一點。報告指出環繞中國的海水位的上升速度比全球平均速度更快，對作為經濟重鎮的主要沿岸城市(上海和香港)造成威脅。長江三峽水利樞紐工程、世上海拔最高的青藏高鐵路等大型基建項目都因為降雨量增加凍土溶解而受到威脅。

中國已經面臨缺水危機，全國人口佔世界人口21%，但卻只獲得全球7%的淡水供應。報告也警告，氣候變化會令中國的水源可以在本世紀中之前萎縮5%。在旱季乾旱的日子會延長，在雨季颱風會更猛烈。

中國的一黨專政政府正面臨巨大的群眾壓力，因為要求停止空氣污染的呼聲愈來愈大，超過500條村落確認為「癌症村」和食水供應有毒。根據環保部的資料顯示，中國有六成的地下水和三分之一的地表水是不適合人類接觸的。

環保抗議正在急升，令中共政權的戰略家響起警號，擔憂這些抗議會演化成更廣泛的反

政府運動。過去三年，與污染有關的抗議數字上升超過一倍。

今年六月，超過五萬人在上海工業區金山遊行，迫使地方政府停止停建PX化工廠，撼動了當區。在五月，天津市葛沽鎮也有類似的抗議，總共有約四千名居民參加，一名發言人說道：「現在上空也污染、地下也污染，怎麼辦這個事情？鋼廠離我們居民區太近……」在四月，內蒙古也有另一場反對化工廠的抗議，主要是由蒙古族農民參與，被二千名防暴警察以橡膠子彈、催淚彈和水砲暴力鎮壓。在內蒙古和西藏及新疆等少數族裔地區，環保抗議正在顯著上升，同時民族主義情緒也因此而升溫，對北京來說這兩者是爆炸性的混合物。

中國對氣候問題的立場

中共政權也面對嚴重的經濟問題，因此被迫嘗試加快轉型至高科技工業以及擴大服務業規模。因此，經過了近年的慘敗之後，中國在巴黎峰會的代表正急於達成一份全球協議，而《經濟學人》指一份國際協議（像中國在2001年加入的世貿那樣的）可以「幫助政府打擊本國的既得利益」。

北京的根本立場並無改變，但愈來愈感覺到全球和本國的壓力，因此在談「環保」時要振振有辭。中美在經貿和軍事問題上的衝突愈來愈激烈，這也影響到中共的氣候外交政策。北京想提高自己在這種氣候會談上的外交姿態，其他國家當然也想這樣，但北京會更想。

一如既往，中國只同意減低每元經濟增長的碳排放量，即只願意降低排放速度而不願意減排。中國也承諾碳排放在2030年會到頂。這承諾太小、太遲也太空泛，沒有如很多中國及國際氣候專家所要求的將排放量絕對封頂。北京也拒絕任何獨立的監察和制衡機制。雖然如此，為了幫助資本建制在氣候問題上粉飾太平，予人氣候問題正得以解決的假象，全球很多傳媒還是稱頌中國的「新氣候政策」。

綠色投資，但……

雖然中共宣佈了幾個似乎很大膽的環保措施，但卻是說一套、做一套。國家大規模投資風力發電、水力發電和太陽能發電設施，令中國的可再生能源發力功率領先全球（433千兆
十月評論 2015年第2/3期

瓦），比第二的美國（182千兆瓦）超出一倍以上。（2014年的數據）

但由於停電和浪費等問題，大部分的發電量都沒有被運用。原因包括地方的電網寧願連接煤電站，也不連接至太陽能電場或風電場。因為能源業內部的裙帶關係，也因為地區煤電站的保護主義，也因為中國電力供應網的技術落後，使其不能發揮風力和太陽能供電的潛力。2015年的電力浪費率增加，以風力發電來說的浪費率由8%上升至15%，而全球煤炭價格大幅下滑（自2011年以來下跌60%）也是另一原因。

根據《財富》世界500強排行榜顯示，中國國家電網公司是全國最大的能源供應商，在全球則是第七大，在澳洲、巴西、菲律賓和葡萄牙都有主要投資，在中國也是最大煤電站的擁有者之一，當然會親疏有別了。

煤電泡沫

與其他問題一樣，不同的機關表面上都由黨國控制，但實際上各走各路。北京宣佈推動可再生能源的政策時，省政府卻下令提高煤電量。根據中國多間大學及綠色和平的一份報告對「煤電泡沫」作出警告，指單單今天已有155個新建的煤電站。

如果這些煤電站以正常的水平發電（中國的煤電站現時以低於總電量的水平發電），將會排放5.6億噸二氧化碳。根據《紐約時報》報道：「這相當於巴西的總能源排放量」。這些投資總值740億美元，代表著對氣候以至中國金融體系的威脅。

中國水力發電工程學會副會長張博庭表示：「今後數年，我們將看到這些工廠造成的浪費。鋼鐵和水泥等行業已經出現了這種情況。」

中共政權固執於「國家資本主義」的發展模型，也被億萬富豪的裙帶利益所制肘，並不能根本性地擺脫破壞環境與債務問題。現在需要社會主義替代方案：將能源業及主要企業置於民主公有下，全面實現民主權利，結束鎮壓與政治審查，並組成工人階級佔多數的政府。

本文原登於《社會主義者》雜誌第35期

關於烏克蘭問題的聲明

第四國際國際委員會(2015年4月23日)

以下關於烏克蘭問題的聲明在 2015年2月的第四國際阿姆斯特丹國際委員會上通過。

1- 在過去一年，頓巴斯戰爭已導致至少5000個男女(大部分是平民)和2000名左右的士兵死亡。超過 1,500,000 人在戰爭的驅逐下，被迫離棄他們的房子和財產；其中一半左右的人作為難民在俄羅斯，其他人則在烏克蘭的不同地區。

在前線兩側的烏克蘭東部地區，數以百萬計的居民發現自己遭受人道主義災難，處在事實上的戰時威權體制下，戰爭使人們無力抵抗社會攻擊。

2- 由於擔心像麥登廣場那樣的俄羅斯社會和政治運動，普京把基輔的後亞奴科維奇 (post-Yanukovitch) 政權描述成由反俄羅斯的法西斯主義者控制的政權，歪曲事實真相，以使其吞併克里米亞的行為合法化，讓其所謂“保護”俄羅斯人的要求合理化。雖然“烏克蘭人”常常被等同於“法西斯主義者”，由莫斯科在烏克蘭東部導演的“混合戰爭”，旨在破壞該國轉向西方制度的做法，改變了烏克蘭政治生活：日益增加的仇恨和歇斯底里的報復言論，被全國的統治精英用作他們反社會政治的藉口——而頓巴斯的人民，作為後蘇聯時代的“愛國白癡 vatniki” (對工人服裝的貶義描述)，被提交給了基輔的名譽掃地的災難性“反恐行動”(ATO)。

3- 因此，我們呼籲烏克蘭、俄羅斯、歐盟及全世界的左翼活動分子和工會會員破除單邊偏執 (campist) 邏輯，因為這種思維危害工人團結，只會有利於烏克蘭以及俄羅斯和歐洲其他部分的右翼和保守勢力。

在烏克蘭，立足于民主和左翼立場，左派、工人和其他進步運動的再統一仍是可能的，但這樣做的前提，是降低軍事對抗和停火。戰爭每

一天都在加強衝突雙方的右翼和激進民族主義 (有時候是公然的新納粹)，使得獨裁專制在烏克蘭各地橫行。此外，這種團結和再統一是打破戰爭邏輯的唯一途徑，可以穩定和平並且鞏固作為一個獨立和民主社會的烏克蘭國家。這意味著與所有的衝突受害者團結，捍衛勞工、社會和民主的權利，包括語言地區的憲法權利，和通過人民的自我組織和表達來實行的民族自決權。

所以，我們贊成停火以及國際控制 — 因為沒有可行的逐步軍事解決方案。在現有的條件下，我們知道，這種停火協議將由反動的國際國內涉事者簽署。因此，絕對地獨立於那些涉事者是必要的，制定停火條件的明確判定方法是必要的，因為要讓未來的條件能保護真正的 — 意即民主和公正的 — 和平，這個和平的基礎是人民捍衛他們的社會政治權利和選擇的運動。

4 - 我們不承認俄羅斯控制或者拆除烏克蘭的任何“歷史”權利，我們支援所有烏克蘭 — 包括克里米亞和頓巴斯 — 人民的自決權，這個權力在獨裁和軍事壓力下無法自由表達，沒有任何真正的民主程序和政治選擇。這就是為什麼我們譴責克里米亞被吞併的緣故。

我們不承認1991年華沙條約組織解散後的北約東擴具有任何合法性，也不承認西方帝國主義主宰烏克蘭政治選擇的任何企圖和手段。但是，大俄羅斯政策的過去經驗，普京政權的壓制性，頓巴斯戰爭和克里米亞被吞併，使得在越來越多的烏克蘭人心中，北約的合法性得以加強了。

這個實在的侵略把反普京的烏克蘭愛國情意結納入了東烏克蘭。即使在頓巴斯，親俄力量也很難調動和控制整個地區。但是基輔的政策和"反恐行動"是一場災難，導致大量民眾支持要求更多的自治權。然而，在2014年12月，絕大多數的受訪者贊成分別保持烏克蘭這兩個地區的地位，僅有 6%和 4%的受訪者認為應讓反叛領土獨立或加入俄羅斯聯邦。這種情況是非常異樣的，令人困惑，而且看起來似乎一個城鎮或村莊同另一個城鎮或村莊情形不同。

那些"頓巴斯人民共和國"(以及俄羅斯)的領導人，完全沒有能力提供任何政治自由和安全的日常生活以及社會權利，對此，民眾的關切和幻滅越來越多。即使有強大的"區域"身份認同，有對基輔政府不信任的態度，這都並不意味著積極支持暴力和非民主力量。頓巴斯"人民共和國"完全缺乏民主運作：同那些所謂的人民共和國相比，即使在烏克蘭其它地方，烏克蘭共產黨都有更多的可能性，可以表現自己，提出候選人——儘管有一些要禁止它的聲音。當地居民已成了雙方炸彈和罪惡的人質。

5- 因此我們贊成立即停火。但我們不承認明斯克協定的政治內容。

除了事實上承認克里米亞的吞併，更明確的做法是，通過秘密外交程式，為烏克蘭建立新憲法，這個過程是由大國和政府領導的，以分配其"勢力範圍"：對於這種做法，我們持譴責態度。

普京的目的，是要對烏克蘭的選擇作某種程度的控制，而無須支付這一地區的工業從基輔那裡得到的補貼。所以"NovoRossya"的稱謂棄而不用，代之以更有公信力，比較"有限的"烏克蘭國中"國"的計劃——比如"斯普斯卡共和國 (Republika Srpska)"(波士尼亞裡面的塞爾維亞內"政體")。該協定包括烏克蘭憲法的變化，把法律和司法系統交給當地領導人，作為任何邊界控制的前提條件。

明斯克談判不允許對鐵路節點德貝爾茨夫 (Debeltseve) 的狀態做協定，那裡有數千烏克蘭士兵。征服它，可能要花去超過 1000名士兵的生命，該協議給在頓巴斯的"人民共和國聯盟"以連續性。所以明斯克協議並沒有建立穩定的停火。

6- 在行動上，

- 我們支持在國際控制下有保證的所有停火努力，反對一切軍事攻勢。需要部署未捲入這場衝突的，來自第三國的聯合國維和部隊。
- 我們贊成烏克蘭的中立地位、撤出俄羅斯軍隊，並讓整個區域立即非軍事化。
- 我們支持對雙方展開戰爭罪行的調查，並譴責罪犯。根據目前的國際法，戰爭罪犯應該受到懲罰，而准軍事部隊應解除武裝並解散。
- 我們捍衛修改烏克蘭憲法的民主程序。
- 我們譴責仇外心理和仇恨言論，無論它來自哪裡。我們支持烏克蘭，俄羅斯及歐盟的反法西斯和反戰運動，運動應是獨立於各國政府的，並且批判種族主義和戰爭宣傳。烏克蘭並不是一個"歷史的錯誤"；俄羅斯人和烏克蘭人都不應被妖魔化。
- 反對來自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歐盟的所謂"援助"，因為它進一步打擊社會的權利。我們要求團結國際努力，重建飽受戰爭蹂躪的地區，讓難民和因戰亂而流離失所者返回家園。
- 我們呼籲烏克蘭各地的左翼政治和工會戰士，圍繞社會正義的議題，團結起來，停止寡頭們通過離岸稅務躲避的做法而對該國進行搶劫，打破從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借款來償還以前貸款的惡性循環。為了生存和達成社會政治的權利，像希臘人一樣，烏克蘭人民需要譴責和反對緊縮政策，由工人階級採取集體的行動，建立真正支持這種努力的政黨。
- 在俄羅斯、烏克蘭和所有的歐洲國家，或在歐盟之內外，我們爭取另一個歐洲，其基礎是主權人民的自由結合，反對一切統治的關係——對我們來說，那就是社會主義。

墨西哥新自由主義的炮製

埃特加·桑切斯

埃特加·桑切斯·拉米雷斯（Edgard Sánchez Ramírez）是革命工人黨（PRT），以及第四國際墨西哥分部的長期成員。他身處革命工人黨（PRT）的指導委員會，是工人及人民政治組織（OPT）的活動成員，工人及人民政治組織（OPT）是由墨西哥電氣工人工會（SME）在2011年創立的政治組織。海克特·A·裡維拉在墨西哥城進行了這次採訪，桑切斯談到了20世紀80年代後期墨西哥政治中的新自由主義轉向，及其在整個20世紀90年代政治制度上的整合和2000年以來的全面實施。對桑切斯的同一次採訪，還將有一些問與答，談的是墨西哥政治的當前軌跡。

北美自由貿易協定（NAFTA）生效已經20多年了，墨西哥還沒有像上世紀90年代初允諾的那樣，成為發達國家。同時，在政治方面，2000年國家行動黨（PAN）擊敗革命制度黨（PRI），終結了其70年的統治，被認為是一個民主的開放，12年後，這個開放被關閉，革命制度黨（PRI）又回來了。為什麼革命制度黨能夠重新掌權？

你引用的北美自由貿易協定（NAFTA），在回答這個問題時非常有用。許多分析師甚至談論“革命制度黨（PRI）的復辟，”但是我們革命工人黨人不認為革命制度黨（PRI）的回歸是這樣的“復辟”。這不是20世紀的那個革命制度黨（PRI）的回歸。

儘管現任總統恩裡克·培尼亞·涅托，是阿特拉科莫爾科集團（Atlacomulco group）[革命制度黨內部的政治派別]的成員，但這不是福利國家和革命民族主義時代的革命制度黨（PRI）的復辟。這個革命制度黨（PRI）不是我們定性為墨西哥革命後的那個波拿巴政權。[1]

這個波拿巴主義政權把自己看作墨西哥革命的繼承人，看作為一個革命政府。它不只是闡述整個意識形態話語，但它也實行一個典型的政治波拿巴主義，對一些民眾要求讓步。這正好與十月評論 2015年第2/3期

世界其他國家的凱恩斯主義做法和福利國家的興起一致。

今天，培尼亞·涅托對這一點無所可做。相反，他通過國會在2013年和2014年推動的結構性改革，不僅是反動的和新自由主義的，這些改革實際上是反革命的，因為它們把國家推回到1938年之前。他推動的能源“改革”法就是這個情況，該法案使1938年被沒收的美國和英國石油公司得以歸還。

因此，這就是革命制度黨（PRI）的回歸，但它同20世紀的革命制度黨（PRI）沒有任何關係，同被稱為民族主義革命的時期沒有任何關係。相反，這是一個新自由主義的革命制度黨（PRI）。

20世紀80年代，當新自由主義一派接掌革命制度黨（PRI）時，波拿巴主義政權不復存在。這新一代革命制度黨（PRI）的領導人，如卡洛斯·薩利納斯·戈塔里（Carlos Salinas de Gortari），曼努埃爾·卡馬喬·索利斯（Manuel Camacho Solís），路易士·多納爾·科洛索奧（Luis Donaldo Colosio）和埃內斯托·塞迪略（Ernesto Zedillo），這整個“芝加哥男孩（Chicago Boys）”集團——我們會這般稱呼他們——回到了墨西哥，控制全黨並開始改變政權。這個過程始於前總統米格爾·德·拉馬德里，時間是1982年至1988年，但它不鞏固，直到在1988年的選舉中卡洛斯·薩利納斯·戈塔里強佔權力。

這個新自由主義政權上臺後，在經濟和社會方面推動新自由主義計劃，也連帶著民主的整個話語權和一黨統治的結束。然而，新自由主義並不是民主的，這在墨西哥已獲證明，因為薩利納斯通過1988年的選舉舞弊而霸佔權力。

薩利納斯的候選人資格，及其後來的總統任期如何反映革命制度黨（PRI）裡面的這些變化？

薩利納斯對他自己的黨，即革命制度黨（PRI），有很多批評。他經常辯說，對農民或工會作出的歷史性讓步已經成為國家的負擔。薩利納斯不是強調通過被稱為“團結（solidaridad）”的社會計劃而“團結”。他走得更遠，鍾情於創始一個新政黨——團結黨（the Solidarity Party）——的想法，以便擺脫對大眾行業和腐敗工會領導人的那些歷史性讓步。

薩利納斯的反社團主義話語，甚至吸引了一些左派到他的身邊。他的整個話語強調了個人權利在那些工會和農民組織之類的“特殊利益集團”之上。最後，薩利納斯無法創建一個新的政黨，而是依靠革命制度黨（PRI）的反民主結構及其共同工會和農民的連接，在1988年的選舉中贏得一個舞弊的選舉。

事實上，當他上臺之後，薩利納斯把華金·埃爾南德斯·加利西亞監禁了起來，後者別名“奎寧（La Quina）”是國家石油工人工會的負責人，這作為一個跡象，表明政府將不再容忍腐敗的工會領導人。培尼亞·涅托（Peña Nieto）在2013年時做的正是同樣的事，當時他把教師工會的腐敗頭目厄爾巴·埃絲特·戈迪略（Elba Esther Gordillo）關入監獄。

但是，在薩利納斯的情況，應該說清楚的是，他先把“奎寧（La Quina）”關入獄，懲罰他支持總統候選人庫奧特莫克·卡德納斯 [墨西哥前總統拉薩羅·卡德納斯將軍的兒子，主張墨西哥石油業界的國有化而聞名——一般認為，由於革命制度黨（PRI）大規模的舞弊工程，他的總統位置在1988年被竊取]。

其次，我們之所以談論石油工人工會——因為那些工人的力量，它是該國最重要的——也因為這是石油行業。企圖要馴服工會內部的民族主義傾向，使其不會阻擋其私有化之路，這才是開始。

革命制度黨內新自由主義政治的崛起，如何影響了政治舞臺？左派如何反應？

由此帶來了政治制度和所有其他政治力量的轉型。我們經常談論左派在新自由主義進攻下的

十月評論 2015年第2/3期

危機，但它不只是針對左派。所有主要政黨派都在轉型，首先，是革命制度黨，它背棄了民族主義，成為新自由主義黨。

革命制度黨內部的這種轉變挑起了庫奧特莫克·卡德納斯 [他在1989年創立了民主革命黨] 引起的分裂。卡德納斯實際上代表了老革命制度黨及其革命民族主義的計劃。卡德納斯在1988年的選舉中運用民主陣線的選票，反對薩利納斯時，他自己也承認這一點。他說，主要目的是為了保存維護革命制度黨的歷史綱領，因為這個綱領是反對薩利納斯和新自由主義者的。

因此，要我們作為革命制度黨在1988年支援卡德納斯的候選資格，是不可能的。他爭辯說，目標是回到老的革命制度黨，在它被新自由主義控制以前，——自從1968年的學生大屠殺，自從1971年被稱為“鷹擊（El Halconazo）”的學生大屠殺以來，自從左派合法化以來，自從“骯髒戰爭”的失蹤事件以來，自從1985年墨西哥城地震發生後，我們一直與這個政權一起戰鬥。

縱觀那整個時期，卡德納斯和他的團隊一直在革命制度黨內。所以，當卡德納斯出來宣佈，他將保存老的革命制度黨，我們完全拒絕了他的計劃，因為我們不僅是新自由主義的替代者，我們也是老革命制度的一個替代者。

雖然，事後應該說，那時，我們也許沒有完全把握革命制度黨內正在進行中的新自由主義轉變。這種轉變也對國家行動黨（PAN）以及左派造成了後果。

在國家行動黨（PAN）——一個遵循基督教民主的資產階級政黨——的情形裡存在一個分裂，就像革命制度黨在卡德納斯和薩利納斯之間的分裂一樣。國家行動黨（PAN）的分裂，發生在其遵循基督教民主路線並擔任革命制度黨歷史反對者的正統派和新自由主義派之間，後者由迭戈·費爾南德斯·德·瑟瓦羅斯（Diego Fernández de Cevallos），曼努埃爾·科勞替爾（Manuel Clouthier）和一群提出更務實政治看法的北部商人領導。

1988年總統大選後，國家行動黨（PAN）推出了

論題，主張非民主起源的政治制度，一旦當權，仍然可以通過自己的行動把本身合法化。這導致了國家行動黨（PAN）和革命制度黨（PRI）之間的歷史性協議。國家行動黨（PAN）與革命制度黨（PRI）有效地和平共處。這個協議的根源是這兩黨的新自由主義轉向。

這協議包括些什麼東西，它如何有益於國家行動黨（PAN）？

革命制度黨和國家行動黨之間的聯盟導致了所謂的“concertaciones”，這是指一系列的秘密會議，在那裡，薩利納斯當局和國家行動黨領導層協商國家行動黨在地方長官競選中的崛起。通過這些談判，國家行動黨第一次“榮獲”它在下加利福尼亞州（Baja California）和瓜納華托州（Guanajuato）的州長職位。

作為交換，國家行動黨（PAN）認可和支持薩利納斯政府——它已通過舞弊在1988年贏了選舉，薩利納斯需要無可爭議地控制政府。所以，實際上，這兩個政黨決定就民主權利進行談判，並首次提出總統易手的可能性。這提供了一個民主在進步之印象的外裝。

事實上，國家行動黨（PAN）想要的是美國模式——一個兩黨制。然而在實踐中，革命制度黨和國家行動黨代表的都是資產階級利益，他們倆爭相獲得美帝國主義的支持，都在努力證明，他們最有能力推進那些利益。

總之，革命制度黨和國家行動黨之間不存在任何實質性的差異。因此，那是無關緊要的，因為無論是國家行動黨上臺還是革命制度黨留在總統職位上，他們都服務於相同的利益。

例如，當培尼亞·涅托推動新自由主義結構改革時，事實上，國家行動黨（PAN）不高興，因為維森特·福克斯（Vicente Fox）[71年來，第一個非革命制度黨總統，于2000年當選]和費利佩·卡爾德龍（Felipe Calderón）[福克斯的繼任者，在廣泛欺詐的基礎上，2006年大選時贏了卡德納斯]的時代以來，他們本就想推動這些改革。國家行動黨（PAN）提出改革時，革命制度

黨（PRI）抵制他們，不是因為他們反對私有化，而是因為他們自己想成為改革的推進者。

此外，國家行動黨（PAN）聲稱，革命制度黨（PRI）內部的變化，對於國家行動黨（PAN）是一個歷史文化的勝利——這意味著私有化，並與工會和農民組織決裂，這一直是國家行動黨（PAN）計劃的核心。

你會認為，過渡到一個新的政治現狀，是預先策劃的嗎？國家行動黨（PAN）在2000年上臺時，新自由主義計劃又是如何體現的？

我不會說這種政治意識形態的轉變，是以權謀的方式預先策劃的。但這個過渡，一直旨在廢除波拿巴主義政權，標誌著剔除舊政權的新自由主義寡頭權力結構的到來。

因此，當福克斯在2000年就任總統時，就所謂的民主過渡，他做了一個著名聲明，說他的政府將是“商人治理，商人享有和商人擁有的政府。”這正式標誌著一個轉捩點，即資產階級接掌波拿巴政權。從這點出發，資產階級的人員控制了國家，認為政治家是腐敗的，這就是為什麼他們推出比森特·福克斯的緣故，因為後者不是政治家，而是一個商人。

國家行動黨（PAN）把福克斯作為一個個體推出，高舉新自由主義原則，即真正重要的是個人，而不是政黨或綱領。例如，不像革命制度黨（PRI），福克斯比較非正規。他不同於喜歡正式著裝的革命制度黨（PRI）政治家，事實上，他穿著牛仔靴和一個大的皮帶扣，其上寫著“狐狸”。他說話不像個政治家。因此，他顯得像是獨立的個體，而不是其黨的代表。但是，這只是表面。上任後，福克斯的第一個行動是走入大教堂大眾，背著十字架走進國民議會。

福克斯的說法是，商人沒有像政客那樣腐敗，因為他們生意的財富是他們自己工作的結果。其實，這是詭譎的，因為俗話說，“私產即盜竊。”然而，國家行動黨（PAN）聲稱自己不是竊盜，不像政客革命制度黨（PRI）。當然，我們認為，階級剝削也是竊盜。

但一旦國家行動黨（PAN）掌權，像革命制度黨（PRI）一樣，他們也成為粗俗的盜賊。一個例子是瑪塔·薩阿貢（Marta Sahagún）[福克斯總統任期時的墨西哥第一夫人，據說，她用自己的影響力來幫助其兒子的公司獲得墨西哥國家石油公司的大合同]的兒子。另一例是葉真理[中國商人牽連到2007年墨西哥的販毒醜聞]，在他的客廳裡發現有巨量的現金，他同卡爾德龍（Calderón）政府的勞工秘書哈威爾·洛薩諾·阿拉爾孔（Javier Lozano Alarcón）來往。

洛薩諾·阿拉爾孔還負責破壞國家電力公司“光電中心”（Luz y Fuerza del Centro）[由卡爾德龍政府在2009年拆除，它的工人，在中小企業組織（SME）的組織下，繼續奮鬥，以期恢復他們的工作]。他基本上成了墨西哥工人階級的頭號公敵。他的情況清楚說明了政治階級——黨和政府——與有組織犯罪之間的共謀。

新自由主義如何反過來影響左派？在1988年的欺詐選舉後，卡德納斯組成了民主革命黨（PRD），該黨的計劃是什麼？

這種轉變並沒有事先計劃，但它發生在一個歷史性的巧合中，革命制度黨（PRI）中新自由主義者的到來，使整個政黨制度轉化，然後影響到整個反對派。因此，“民主”過渡發生的時候，兩黨的交替統治是不相干的，因為他們的新自由主義計劃是一樣的。

民主革命黨走出左派的危機，這個危機類似於革命制度黨（PRI）和國家行動黨（PAN）的危機，當時整個墨西哥社會主義左派——無論是共產黨員還是毛派分子——跟著卡德納斯主義（cardenismo）化解成不同類型的政黨。這個黨的戰略目標是通過選舉把革命制度黨（PRI）趕出權力，以他們自己接掌政權為首要事項。

由於這些左翼政黨放棄了社會主義計劃，進入政府，成為其唯一的目標，他們已經成為一個民主革命黨的一部分，而不是社會或社會主義革命的一部分。因此，這些政黨把民主革命等同為輪流領導政府。

民主革命黨（PRD）成員在自己政黨裡發現的所

有缺陷，都不是腐敗誘導的個人缺陷，而是一種轉變，為了尋求選票，這個轉變把所有的社會要求都忽略掉，因為選票和政府職位是會製造民主革命的東西。

國家行動黨（PAN）不喜歡這個計劃，因為他們寧願是兩黨制度中的一方。民主革命黨（PRD）瞄準了三黨制，但排除一個同工人階級有連結的左派政治計劃。

兜了一圈，回到第一個問題，一旦培尼亞·涅托在2012年上臺，革命制度黨（PRI）捲土重來並且說，他們是比已經輪流執政過的黨更負責的政府，因為經過兩屆的國家行動黨（PAN）執政，由於毒品戰爭的後果，國家處於崩潰的狀態。因此，革命制度黨（PRI）捲土重來，但那是新自由主義革命制度黨（PRI）的回頭。

我們今天執政的是一個新自由主義的寡頭。它不再是波拿巴主義政權，在後者那裡的情形，一個政治集團管理國家，而資產階級排除在外。如今，新自由主義的寡頭有幾個支持其新自由主義計劃的政黨為其服務。最有力的說明是墨西哥契約[2012年12月，培尼亞·涅托上任後的第二天簽署]，簽約的各方是革命制度黨（PRI）和國家行動黨（PAN），還有民主革命黨（PRD）。

因此，發生在墨西哥的變化是深入的變革，它也改變了政黨制度的本質。重要的是，在這裡要提到北美自由貿易協定（NAFTA），因為它標誌著與過去的決裂。雖然，伴隨著北美自由貿易協定（NAFTA）的經濟發展的整體話語是虛假的，但一個歷史性的轉變，確實發生在墨西哥的政治體制中，因此也出現在墨西哥政黨的性質中。

轉載於socialistworker.org

註

[1]此引用的是，托洛茨基把馬克思主義傳統的公式發展並應用到墨西哥上，經過1910-20墨西哥革命，在人民力量與資產階級力量兩方面之間產生了僵局。威拉（Villa）和薩帕塔（Zapata）率領的革命力量在1914年接管墨西哥城，但資本主義並沒有被推翻和被取代。據托洛茨基的分析，興起的是一個拿破崙黨的政權，這個政權假裝超越不同階級的鬥爭，而執政的背景是國際資本主義體系。

非洲還剩什麼？反思紮根於非洲大陸的左翼勞動階級運動的失敗

法羅則·曼吉

20世紀50年代早期，在自由解放理想的鼓舞下，整個非洲大陸見證了人民運動的風起雲湧——解除了殖民枷鎖。整個非洲大陸，民族主義政黨使人們相信，政治獨立是達到自由的路徑。自那時以來，用數百萬非洲人的生命鮮血換來的許多獨立成果，已經反轉為公共設施的私有化，反轉為土地的剝奪，失業率和食品，房租及其他生活必需品費用的不斷上升。作為回應，整個非洲大陸的不滿情緒日益增長，在某些情況下，忿怒的爆發和群眾暴動導致帝國主義孕育和培養的政權（例如突尼斯、埃及和伯基納法索）被推翻。在這種情況下，人會想到，整個非洲大陸，足以孕育出強大的左翼工人階級運動。但這為什麼沒有發生呢？

幾十年來，各種規模的，具有各種影響力的左派和共產黨出現在非洲大陸的很多國家，儘管他們面臨殖民壓迫的恐怖。許多情況下，在爭取獨立的鬥爭中，這些政黨的政治戰略是同民族主義政黨合而為一的。遵從當時主導的信條：這是革命的‘戰略’觀，根據這個信條，共產黨人不僅要支持民族資產階級的出現作為‘民族民主革命’的一部分，還要服從民族主義運動的領導——就如我們所看到的，自1994年以來，南非共產黨服從于非洲國民大會（ANC）的領導。

為了政權，大多數民族主義政府經常獲得左派的支持，他們認為，為滿足群眾要求而需要做的一切，就是控制國家。但他們忽略了，國家本身是一個殖民地國家，它的設置是服務，保護和促進帝國主義強權及其公司和銀行夥伴利益的。這個國家壟斷暴力的使用。它有員警、軍隊和秘密員警，在必要時，它使用軍隊和暴力，保護資本主義週邊經營方式的利益。

佔據了國家權力後，獨立的政府基本上是尋求適度的改革，主要是消除國家的種族化，對它進行現代化改造，以便經濟能更充分地納入美國、歐洲和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著手建立的新興國際秩序。國家控制的機構、員警、軍隊和特種部

隊——甚至殖民強權建立的本土政權的權力架構——所有這些基本上都原封未動，儘管裝扮有國旗的顏色。資本主義的國家機構被完整保留，即使在那些聲稱是馬列主義政權的國家中也是如此，例如，門格斯圖（Mengistu）的埃塞俄比亞。

很少有人瞭解這些佔據的危險，更不會去創建資本主義國家的替代品。其中必須提到的有派特裡斯·盧蒙巴（Patrice Lumumba）（剛果），阿米爾·卡布拉爾（Amilcar Cabral）（幾內亞比紹）和湯瑪斯·桑卡拉（Tomas Sankara）（布基納法索）。他們都致力於建設殖民地國家的替代品。顯而易見的是，所有三個人都被與帝國合作的他們自己的同志暗殺了。

卡布拉爾（Cabral）曾慷慨陳詞：“我們認為，有必要把我國殖民政府的各個方面完全摧毀、破裂，變為灰燼，以便讓我們和人民完全自主”。

雖然國家的壓制武力可能會穿上新制服，但它們的作用——保護資本主義在（前）殖民地的利益——保持不變，因為新興的中產階級和現在佔據新殖民主義國家權力的黨政官員們意識到，私人積累和利用國家權力進行搶劫的潛力可觀，所以他們對轉型國家的興趣退卻了。

‘非洲化（Africanisation）’——或用南非案例的說法，‘黑色經濟強權’——是新興民族資產階級的吶喊，要把他們對私人積累源頭的掌控合法化。出現了越來越多的跨國公司和國際金融機構，他們日益增長的‘投資’興趣——主要集中在採礦業——提供太多賺錢的機會，讓他們甚至不會去考慮對經濟權力作更改。國家成了蜂蜜罐，因而經常成了新興階級不同派別之間的衝突場地。在某些情況下，左派的領導成員加入了民族資產階級行列，正如我們在南非西瑞爾·拉馬福薩（Cyril Ramaphosa）和其他人身上所看到的。

正像法農（Fanon）說的：民族資產階級發現它作為仲介的歷史使命。……其作用並不是改變國家，而是平淡無奇作為輸送帶而服務於資本主義，

被迫躲在新殖民主義的面具背後偽裝自己。民族資產階級，無所顧忌而傲慢自大，陶醉於作為西方資產階級代理人的角色。這個有利可圖的角色，這個卑劣騙子的作用，這狹隘的心理和雄心的缺乏是民族資產階級無能的症狀，無能履行其作為一個資產階級的歷史作用。

為了履行其作為西方資產階級代理人以及‘卑劣騙子’的職能，這個階級轉而對付曾經幫助它奪權的左派，殺戮左派，囚禁左派、放逐左派或使它邊緣化。以屠殺為例，1971年，蘇丹最強大的黨派之一共產黨遭到屠殺，嘎法·尼邁裡(Gaafar al-Nimeiry)發起一場運動，幾乎徹底消滅了該黨。即使在有組織的左派並不強大的地方，後獨立期也出現了對中堅分子的暗殺：例如，在肯雅，湯姆·博亞(Tom Mboya)、皮奧·伽馬·平托(Pio Gama Pinto)和JM 卡利烏克(JM Kariuki)遭到暗殺，或在南非，克利斯·哈尼(Chris Hani)遭到的暗殺，和最近發生的對南非金屬工人工會(Numsa)成員和棚戶居民運動(Abahlali base Mjondolo)成員的暗殺。

‘非洲社會主義’作為對後獨立期早年非洲大陸不發達的回應而獲得表揚，但在每種情況下，這同只許有一個合法政黨的要求相結合。無論那種實際政治色彩的政權，宣佈效忠於社會主義，對於民族主義者並不罕見，儘管是‘非洲’版本的社會主義。

誇梅·恩克魯瑪(Kwame Nkrumah)也許是最激進的民族主義者，但即使在加納，也從未嘗試過解構殖民國家。因此，激進化蔓延於人民中。在1961年，鐵路工人舉行了全國性的罷工，但政府變得越來越專制，獨立的政治組織遭受打壓——直到最終成為一黨制國家。恩克魯瑪的政治著作，在1966年推翻他的政變後，變得更加激進。

同樣，朱利斯·尼雷爾建立他自己特定品牌的社會主義——烏賈馬(Ujamaa)——桑吉巴島革命的結果，在這場革命中，他精心策劃鎮壓阿卜杜勒拉赫曼-巴布-烏瑪(Abdulrahman Babu's Umma)黨。尼雷爾的《阿魯沙宣言》宣佈成立一黨制國家，防止左派的獨立組織，防止工人階級組織。曾經的熱情工會主義者，艾哈邁德·塞古·杜爾(Ahmed Sékou Touré)領導幾內亞在1958年獨立，十月評論 2015年第2/3期

並在1960年，宣佈他的黨，幾內亞民主黨(Parti démocratique de Guinée)成立，是唯一合法的政黨。自稱‘社會主義’結合一黨專政的國家，以其自己一黨專政的壓制形式建立蘇聯式史達林主義，及其隨著柏林牆的倒塌而最終的消亡——所以這一切，有助於詆毀‘社會主義’作為進步力量的思想。在許多國家，社會主義一詞成了髒話，消失於日常詞彙中。

還有另一個抑制非洲左派發展的因素需要考慮。三十年來的新自由主義政策，不只是導致了物質的剝奪，而且還導致了記憶的剝奪。許多人出生在結構調整方案實施以後的年代，在CNN和麥當勞文化的環境中，他們失去了同自己歷史的聯繫。

正如米蘭·昆德拉(Milan Kundera)所說：清洗一個人的第一步，是要抹去其記憶。毀滅它的書，它的文化，它的歷史。然後讓人寫新書，製造一種新文化，創造新的歷史。不久，全民族將開始忘記它的現在和它的過去。它周圍的世界會忘記得更快。…人類反抗權力的鬥爭是記憶對抗遺忘的鬥爭。今天仍然存在建設強大左派，建設工人階級運動的挑戰。無論我們的歷史可能遺留給我們什麼樣的限制，現實是：在獨立後，我們國家的資產階級未能兌現他們的承諾。

這個階級心甘情願實施了三十年（或二十年，南非的情況）的新自由主義政策，導致大多數人的條件在許多方面反而比他們獲得獨立時更糟。今天，不滿正在增長，尤其是在青年中。對後殖民政府的不滿也更廣泛，因為他們的信譽和合法性已喪失。關於這個階級領導解放的能力，越來越嚴重地受到質疑。

客觀條件，至少為建設一個左翼運動，潛在地提供了良好的條件。但是，在對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性質的四十年分析的基礎上，這是做不到的，儘管大部分左派已習慣於這個分析。還有工作要做，要加深我們的理解，要理解在今天的金融化資本及其在‘邊緣’運作方面的性質發生了變化。這種分析是必要的，如果我們要瞭解這個事實，即工作場所不只是通過強佔而積累的地方——它是通過租金，醫療和社會福利、教育、土地、水、電等的私有化而抽取收入和財富的地方。所有這些都依靠投機活動。

貿易問題：為大公司使得世界更安全

尚恩·斯塔爾

跨太平洋夥伴關係（Trans-Pacific Partnership）意欲擴大美國在東亞地區的霸權。經過五年的緊張談判，跨太平洋夥伴關係（TPP）可能在今年年底實現。關於TPP對美國勞工的消極後果，已有很多論述（而且說的都正確）。但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具有的國際影響是什麼，在充斥雙邊和多邊貿易以及投資條約（僅國際投資條約就超過 3,200項）的世界，這會有什麼不同嗎？

當全球資本主義的未來似乎取決於中美關係的時候，為什麼美國不允許世界上最大的出口國中國（已表示出興趣）加入 TPP 談判呢？

由於包括中國在內的許多前第三世界國家（或“新興市場”）的驚人增長，導致全球資本主義的擴張和高度的一體化，這正是上個世紀四、五十年代的美國政府規劃者所設想的理想世界——一個對西方資本主義，特別是對美國企業開放而且友好的世界——終於在形成中，這超越了他們最狂野的夢想。幾乎每個政府（只是程度不同）現在都把國家的發展，等同於提高國際競爭力，要使他們的國家對全球資本（經常的情況是，這並不是指美國的資本）是安全的。

在地緣政治上，阿富汗、伊拉克、利比亞的毀壞、敘利亞的戰火正酣，以及美國與古巴及伊朗的關係明顯變暖，這一切，縮短了刺耳的“反美”（換言之，地緣政治上獨立於美國者）區域競爭對手的名單，即使俄羅斯最近已重返該名單上，也依然如此。

但是，在美國霸權下，在長達七十年的全球資本主義擴張和鞏固過程中，一個奇兵突起：就

十月評論 2015年第2/3期

是進進出出這個過程的中國。

一方面，中國從一個二十世紀主要的反資本主義和反西方帝國主義的國家，變革到了二十一世紀最渴望融入全球資本主義的國家之一——說其出人意料，毫不為過，當然，這也是美國資本的福音。

另一方面，中國，這個既狹隘又自由的國家資本主義怪異堡壘，在地緣政治上，仍然相對地獨立於美國。所有大型經濟體中，對於地球上的外國資本，中國同時是一個最開放又最封閉的國家。許多高端部門——如銀行、能源、電信和公用事業——是對外國資本完全封閉的。然而，很多其他行業，則是比較開放的，而且外國投資已經深深地滲透到中國，滲透程度大於大多數其它大型經濟體（如日本），特別是在那些處於類似發展水準的行業，更是如此。

然而，儘管過去三十年，對拉動中國的增長速度，外國直接投資起了重要作用，政府仍對外國投資維持比大多數其他國家更多的限制。在2015年外商投資產業的指導目錄中，中國規定，完全禁止三十六個行業中的外國投資，還有三十八個行業是受限制的（外國公司經常被迫與中國企業組成合資企業）。而在1995年發佈的第一批目錄裡，有多得多的行業受到限制，美國資本顯然希望中國產業自由化的步伐走得更進一步、更快一些。

美國資本認為中國對外國的智慧財產權（IP）保護不力。有時中國政府明確鼓勵通過技術轉讓的要求，山寨版技術和比比皆是的模仿者而複製西方的智慧財產權（IP）。高速列車和消費

品，如醫藥行業，服裝和電子產品，全是仿造的對象。在蘋果公司發佈其版本之前的幾個月，中國消費者們甚至就已戴著盜版“蘋果手錶”。

中國不再只是“世界工廠”和外資的超級剝削出口平臺——它已經是世界上最重要的消費市場之一，範圍包括汽車、智慧手機、奢侈品和速食食品。中國消費市場的重要性在上升，使得智慧財產權（IP）保護和投資者仲裁成為全球公司的頭等大事。但很長時間了，外國投資者發現狹隘和民族主義的中國政府，及其反復無常的法律制度，並不能可靠的保護他們在中國的利益。

於是，雖然中國已確定地放棄了其反資本主義世界觀，由於其投資做法，現在甚至被一些非洲領導人指責為歐洲風格的新殖民主義（尤其諷刺的是，中國在1950年代和1960年代支持非洲的許多反殖民主義鬥爭），中國的統治階級——現在的中國共產黨（CCP）——既沒有優先外國資本的利益，也沒有優先美國的霸權利益。

相反，中國共產黨優先維護的是它本身的權力。有時，為了推動積累和技術升級，涉及到向外國資本開放某些部門的問題，但總體而言，中國的經濟是國有的和國家控制的，中國的國有企業（SOEs）仍然佔據大多數的制高點。關於國有企業所獲得的優惠待遇，特別是在融資和法律制度方面的待遇，讓外國資本不平而怨氣沖天。

過去三十年來，中國的經濟成功亦使得它那個版本的國家資本主義成了其他國家的燈塔。巴西越來越熱切於它，普京統治下的俄羅斯已恢復活力，還有印度，更不用提法國，可以有把握地說，是決不會放棄它的。當然，在2008年

十月評論 2015年第2/3期

華爾街金融災害之後，美國也把它大塊的“私營部門”（美國國際集團（AIG）、克萊斯勒、花旗集團、房利美和房地美、通用汽車公司——這裡只提一些突出的例子）國有化，但這些措施大體上被視為是臨時的，偏離公私分離的自由主義標準——這項準則，在中國並不存在。

當然，中國並沒有提供全球資本主義的替代物，甚至也沒有提供其中的美國霸權的替代物。中國沒有能力（也沒有意願）來創建一個替代美國霸權的秩序——它只是想增加它的餡餅份額，並被視為平等的夥伴，而不是一個第三世界次級國（或像日本一樣的第一世界附庸國）。

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金磚四國銀行、絲路基金和中國的其他倡議並不意味著挑戰美國主導的機構，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對這兩個機構，中國繼續支持、注資並充分參與。

相反，他們的意義在於為中國提供更多的杠杆，為其在全球的政治經濟中，尤其是在東亞地區，增加迴旋的餘地。類似的全球治理談判，在1970年代也出現過，例如，當時西歐和日本的復興激起了壓力，產生了G7和三邊委員會。但這些都依然處在美國的霸權傘下。

中國增加全球影響力的願望由其政治經濟體制的特殊性——一黨專政下的國家資本主義——所塑造。雖然中國的精英是中國融入全球資本主義的主要受益者，與日本或韓國不同，他們不可能在短時間內擁抱自由民主，需要避免過分從屬於美國。

這是因為中國共產黨的合法性，不僅依賴於持續的經濟增長，還在於洗刷中國“百年恥辱”，因為，1839年——1949年，中國遭受西方國家和日本的不斷侵略。隨著反資本主義鬥爭作

為正統意識形態（雖然大學所有學生仍然必須參加“馬克思主義”的考試）被逐步地淘汰，中國共產黨現在試圖把自己定位為正確的力量，能夠把中國帶回到其歷史上曾經的地位，即太陽系的“中央王國”。

這就是以美國霸權為基礎的東亞地區自由經濟秩序的不確定性。融入此秩序，讓中國精英階層大量受惠，但他們在中國的持續合法性，取決於種族優越感的民族主義計畫，在西方人眼中，這個計畫有變得“過於狹隘”的危險。中國軍事的快速升級，中國東海和南海日益加劇的領土爭端，就是這危險的所在。

這是 TPP 見縫插針的機會。

美國國防部長阿什頓·卡特很好地理解了這一點，他說，這次TPP的簽署，比派另一艘航空母艦到東亞地區更加重要。後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美國霸權長盛不衰，背後的一個核心因素，是它能夠滲透到其他經濟體，從結構上讓其統治階級的利益與美國霸權的利益相一致。日本精英毫不動搖地支持美國的霸權，並不是因為他們被迫，而是因為這樣做，符合他們的利益，。

中國精英階層已經在依賴全球資本主義了，但要確保他們在可預見的未來繼續這樣做，美國需要他們進一步自由化並整合進——並因此依賴於——全球資本（尤其是美國公司）、全球金融（集中於華爾街和美國聯邦儲備委員會），並向西方消費者（尤其是美國）出口產品。

這不是關於中國的全部。上世紀 70 年代，美國一直在施壓日本開放其經濟，而 TPP 繼續這種要求，針對的是日本農民和汽車製造商。馬來西亞、墨西哥和越南是重要的出口平臺，

他們與中國競爭外國資本。澳大利亞、加拿大和新西蘭是美國的重要盟國。從廣義上講，國家越開放，他們對美國的影響也就越開放。但包括中國人在內的每個人都知道，TPP 主要是針對中國的，它是最受地緣政治污染的貿易之一。

TPP 要建立未來的規範和規則，要把地球上最具活力的地區——東亞地區，特別是中國——鎖入以美國為中心的全球資本主義內。如果美國可以與日本和西歐一起（通過跨大西洋貿易和投資夥伴關係）制定智慧財產權（IP）保護和投資者仲裁的共同標準，那麼西方就可以繼續塑造世界其他地方的交易規則。

因此，如果中國想要繼續融入全球資本主義（而它必須這樣，因為經濟增長的急劇下降會削弱中國共產黨的權力），那麼，中國將被迫繼續開放，讓其規則和條例與西方確立的“國際標準”協調一致。順應日益加劇的自由化，也會讓他國效仿的“國家資本主義”的任何衍生替代模式的突出地位減色。

這就是有些人所稱的“結構性權力”——制定制度的規則和規範的能力，以使他人別無選擇惟有就範。結構性權力往往比“關係性權力”更有效，或者根本就強迫別人做某事。它解釋了為什麼儘管中國表示有興趣加入，卻被排除在 TPP 談判之外——這樣，他們就不能夠改變規則。

TPP 的設計師們構建協議來謀取自身利益：保護智慧財產權和投資者仲裁，促進世界頂尖企業的持續主導地位，那些企業仍然是歐洲人、日本人，尤其是美國人的天下。

智慧財產權的保護，能確保先進的知識行業，如醫藥品行業，維持其在健康衛生業的利潤

(而窮人依舊被拒之救命藥物之門外)。美國農業綜合企業將獲利於日本農業的開放，而耐克公司將受益於越南（其大部分鞋在此製造）的進一步自由化。

要瞭解誰獲利，很簡單，只要注意到這個情況就行了：超過六百名的“企業顧問”伴隨著美國貿易代表參與處於保密狀態的談判。而勞工顧問呢？人數是零。

TPP 還將便於跨國企業在勞工、環境、健康、安全和其他法規方面對政府提起訴訟，以便讓納稅人賠償由於“徵用”而來的“未來回報率的損失”。投資者-政府爭端解決機制——已經存在于許多現有的國際投資條約中——將在TPP中得到鞏固和加強，以確保一個單一的、更可預測的標準，因為新個案的數目已破了紀錄。

2011 年，有這樣一個案件，涉及菲利浦·莫里斯公司，該公司援引 1993 香港-澳大利亞投資條約，起訴澳大利亞政府“剝奪”其智慧財產權。澳大利亞通過了一些世界最嚴格的香煙包裝法條，用可怕的腫瘤圖片覆蓋煙盒，並刪除其前面的菲利浦·莫里斯公司商標。TPP 將便於企業在跨國法院挑戰公共衛生和其他政策，規避國內的法律機制。

TPP 在美國是有壓力的，尤其是來自大工會的壓力，後者認為，幾十年的貿易和投資協議，增加了資本對勞工的壓力，導致製造業工作的外包和不平等情形的飛漲。(出於類似的原因，許多歐盟國家都反對更大的跨大西洋貿易和投資夥伴關係，或者說TTIP，但比較側重于投資者-政府間仲裁)。

如果獲得批准，TPP 將是歷史上最擴張的貿易和投資條約，涵蓋了世界GDP的 40%，三分之

一的出口，以及幾乎全球一半的外商直接投資股票。

可能會有新煥發的活力注入 TTIP 談判，該談判停滯不前，其原因是群眾的抗議活動，其中包括超過100萬署名的請願書。它將逼迫中國進一步自由化，並與美國資本的利益協調一致，因為 TPP 成了未來巨型區域貿易和投資協定的模型。最重要的是，在美國國內和國外，它將進一步加強資本對勞工的壓力，確保公司、勞工、和環境法規保持寬鬆。

出於這些原因，很明顯，我們應該反對 TPP ——更不用提任何加強資本力量的國際協議了。左派應撇開保護投資者和企業的“自由貿易”協定，轉而爭取提高勞動和環境標準的國際協定(列入超越純政治辭令的強制性措施)，保護和培養獨立的工會，對資本以及資本流動，施加更大的調節和控制。

但在每個國家反資本的社會力量的平衡出現轉變時，這必會發生。由於前第二和第三世界的國家(尤其是中國)現在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深入地融入了全球資本主義，這場鬥爭在全球資本主義的中心——美國顯得尤為迫切。



瑞士解密：滙豐、毒品和銀行大亨

埃理克·杜桑

英國滙豐銀行，如今在全世界有雇員 260,000 人，分佈在75個國家，自稱有5400萬客戶[1]，是另一個“大到不能倒”的例子。[2] 在過去的十年中，滙豐已為墨西哥和哥倫比亞販毒集團洗淨了8億8100萬美元[3]，後者同數以萬計的火器暗殺有關。這些關係在繼續，儘管我們政府的不同機構，包括貨幣監理署發出了數十項警告。但這項業務的利潤是如此重要，滙豐不只持續做下去，它還在其墨西哥辦事處開設專門的服務，讓毒販可以直接清洗現金儲備。[4]

據透露，滙豐被指控未能遵守規則，防止洗錢，有近\$7000億的轉帳和超過\$94億的美國貨幣購買出自墨西哥滙豐。此外，銀行也違反對伊朗、蘇丹和緬甸的制裁。雖然滙豐公開蔑視這項法律，但它幾乎沒有承擔任何法律後果。在2012年12月，滙豐被罰款19億——約一周的收入——作為其洗錢活動的全部和最終的懲罰。雖然協助及教唆恐怖組織和販賣毒品，可以判處五年監禁，但沒有一名董事或雇員被刑事檢控。銀行董事可以任意參加販毒、違反制裁或進行任何其他犯罪活動。

國際先鋒論壇報(IHT)質詢，對這個案件，司法部門內部是如何說的。根據某些資訊，有幾個檢察官要滙豐認罪並承認違反了法律，這要求銀行把任何超過\$10000美元的交易告知當局，說這筆交易可能有問題。這一請求會導致滙豐失去其在美國的銀行牌照並結束其在該國的活動。經過幾個月的談判，最終決定不提出刑事指控，以避免銀行的倒閉。它甚至決定避免過於損害銀行形象。[5] 這筆\$19億的小罰款，完成於緩刑期內：如當局發現，2013年至2018年，滙豐沒有結束這些做法（沒有定罪），司法部可能重新審理這個案件。這一結果可概括為：“頑皮的孩子！懺悔一周，五年不用再懺悔。”這顯然是一個“大到不能倒”的銀行例子。

2013年7月在關於滙豐的一個參議院委員會上，

十月評論 2015年第2/3期

伊莉莎白·沃倫(麻塞諸塞州地區)詢問代表美國財政部出席聽證會的副部長大衛·科亨，後者負責財政部打擊恐怖主義和金融間諜的行動。她提出了以下觀點：美國政府非常嚴肅地看待洗錢活動。從事這項活動的銀行可能被關閉。那些遭譴責者可以確定地被禁止進行銀行和金融活動，還可能被判處監禁。現在，在2012年12月，滙豐承認為墨西哥和哥倫比亞販毒集團洗錢\$8億8100萬，銀行也承認，很長一段時間裡犯有很多違反制裁的行為。滙豐已支付罰款，但沒有見到有人被處罰，也不見其在美國有銀行被關閉。她問，‘怎麼回事？你要為毒梟洗多少億美元，你要有多少違反經濟制裁的行動，才會有人考慮關閉一家金融機構？’財政部代表回避這個問題，說太複雜，無法給出問題的答案。[6] 參議員得出結論說，如果可卡因毒販重複他的過錯，會進監獄，會被關很長時間，而銀行家們洗數以億計的毒品錢，在晚上仍可以輕鬆地睡在自己的床上，不怕會受到指控。[7]

史蒂芬·格林，滙豐首席執行官(2003年-2010年)，成為英國商務部長

史蒂芬·格林是金融和政府之間的共生關係的一個活生生例證。在這個案例中，它走得更遠，因為他不滿足於自己作為銀行家和部長而服務於大資本的利益。他的‘部長範圍’遠伸至一位英國教會的按立牧師。他寫了兩本關於商業和道德主題的書，特別是‘事奉上帝，還是侍奉瑪門？’[8] 標題摘錄自聖經中的語句，“一個人不能侍奉兩個主。不是惡這個愛那個，就是重這個輕那個。你們不能又侍奉上帝，又侍奉瑪門（‘瑪門’是‘財利’的意思）。(馬太福音6:24)。”瑪門象徵著財富，貪婪和利潤。此名稱出現在亞拉姆語、希伯來語和腓尼基人語中。瑪門有時被比作撒旦。至於史蒂芬·格林，他已獲得大學榮譽學位，顯然碰不得。

他在英國海外發展部開始他的職業生涯，然後

去到私營國際諮詢公司麥肯錫。1982年，他受雇於英國最大的銀行滙豐銀行，在那裡他被迅速提升到高層職位。他於2003 年被任命為執行主任，並於2006年成為滙豐主席，一直呆到2010年。美國當局指控的8億8100萬美元的毒品洗錢和其他非法交易涉及到的期間為2003年-2010年。根據發表在 2012年發行的334頁參議院報告，史蒂芬·格林從一名員工處獲悉，2005年，滙豐在墨西哥安排了洗錢活動，還出現了可疑的交易活動。

還是在2005年，設在紐約的金融服務公司彭博，指責滙豐洗白販毒資金。史蒂芬·格林回答說，這項指控是，'奇怪和完全不負責任的，'把一個偉大和值得信賴的國際銀行的聲譽置於令人懷疑的境地。2008年，美國聯邦當局通知史蒂芬·格林，墨西哥當局發現了涉及墨西哥滙豐銀行和開曼群島滙豐分行的洗錢活動。該機構說，這種活動可能意味著滙豐的刑事責任。[9] 同這項指控的嚴重性相比，隨之而來的一系列警告相當軟弱。滙豐答應改變其行為，但繼續其犯罪活動。

最後，在2010年10月滙豐收到結束這些邪惡活動的停止令。[10] 2012年底，在參議院委員會報告發表後，不同美國安全機構之間討論了幾個月之後，滙豐被罰款19億美金。史蒂芬·格林不能聲稱，他不知道他的銀行不僅在墨西哥和離岸避稅地的行為，而且在中東地區和美國也這樣做。他是集團的首席執行官，也曾是滙豐銀行百慕大有限公司[11]，滙豐墨西哥，滙豐中東地區的主任。他也曾是瑞士滙豐私人銀行控股，和滙豐北美控股公司的主席。

在2012年，當美國決定公開重罰滙豐毒品洗錢時，史蒂芬·格林不再在滙豐銀行。當時他是英國卡梅隆內閣的部長...

事後看來，史蒂芬·格林把時間拿捏的正好，是一件傑作。2010年2月，他出版了一本書，題為：良好的價值觀：對金錢、道德和不確定世界的反思。引言部分提出了以下問題：'可以既是一個道德者又是一個厲害商人嗎？史蒂芬·格林，一個按立牧師和滙豐主席，認為這是肯

定的[12]。'當然，道德人和厲害商人在作者、牧師，以及滙豐主席史蒂芬·格林那裡是同一的。宣傳配合得恰到好處，在那同時，他由倫敦大學東方與非洲研究學院（SOAS）授予榮譽博士學位。

2010年10月，第二次，美國司法部門命令滙豐停止其犯罪活動。此資訊被公開之前，史蒂芬·格林跳下了船。接下來一個月，在大衛·卡梅隆的請求下，他獲得榮譽，被任命為西蘇塞克斯的赫斯比朋特區的格林男爵。令人難以置信，作為一個陰暗的商人，洗了數百萬美元的毒品錢，在2010年11月22日，成為終身貴族成員，上議院議員。比犯罪小說更奇怪！

2010年12月他辭去了滙豐的職位，2011年2月，成為貿易和投資部部長。[13] 按在這種方式，他繼續服務於英國公司的利益，英國公司與他有非常密切的關係，因為2010年5月以來，他擔任英國工業聯合會副主席。史蒂芬·格林也用他的知識推動倫敦成為2012年奧運會的候選者，奧運會在7月舉行，正是美國參議院發表其關於滙豐事件報告的時候。史蒂芬·格林拒絕回答上議院議員關於這樁醜聞的提問。他受到上議院保守黨黨團主席的保護，藉口是，一位部長不能回答與其職位無關的問題。[14]

在2013年，大衛·卡梅隆讚揚格林男爵的高超工作有益於英國出口及商業條約，特別是讚揚他對歐盟—美國的跨大西洋條約的工作。[15] 在推動英國軍備銷往世界各地出售上，他也取得了明顯成績。他在 2013年12月完成他的任期，現在致力於把他的寶貴時間用在會議發言上（也許換取重要的費用），用於獲取這麼多學術機構堆在他身上的榮譽。他的職業生涯當然沒有結束。他的虛偽沒有限制。2009年3月，在滙豐整個捲入那著名洗錢事務的同時，他還有臉在新聞發佈會上，就始於2007年-2008年的危機責任宣佈：'所有這些事件的背後，都是一個關於文化與產業倫理的問題。太多的時候，它好像是，人們已經放棄詢問要做的正確事情是什麼，只注重是否合法和遵守規則。'而且，'已有太多的人深深地損害了行業的聲譽。[16] 這就是流氓和無賴，史蒂芬·格林，如何凌駕於法

律之上，對急於重複討好他的各地主流媒體走狗的說話。2015年月，‘今日世界’，正直的英國‘皇家國際事務研究所’的評論，出版了史蒂芬·格林長篇訪問，炫耀他在世俗事務上的偉大博學；那是一場美化高層銀行強盜的宣傳運動。標題很長，‘滙豐前主席，終身親德者，虔誠的基督徒，赫斯比朋特區的格林男爵談論歐元區的未來，空空如也的大教堂，以及什麼使得中國領導人不安’。在採訪中，史蒂芬·格林說：‘重要的是，用價值感和責任感對待商業生活：你不能得出結論，銀行業脫離了限制。這將意味著銀行在本質上是邪惡的活動領域，一個自重的人不應該在它裡面。這是一派胡言’。全不提關於滙豐主辦的偷稅或毒品洗錢活動；是遺漏嗎？

結論

格林及其所有滙豐親信的有組織地洗錢，應該在法庭面前為他們的罪行作回答，應受嚴重譴責，限制自由一段期間並參加社區服務。滙豐銀行應該關閉，其董事會應解散。銀行應分成更小的單位，置於公共控制下，要有嚴格定義的公共服務目標。

由邁克·斯基翻譯

「第三世界免債委員會」

註

[1] 見官方網站: <http://www.hsbc.com/about-hsbc>

[2] 參見: 銀行和新的‘大到不能倒’的原則，2014年3月13日，<http://cadtm.org/Banks-and-the-New-...>；和“出現在美國的房地產業的銀行濫用和非法止贖權”2014年4月，<http://cadtm.org/Bank-abuses-in-the-...>

[3] 滙豐銀行也曾與一家涉嫌與基地組織合作的沙特銀行有過交易。美國司法部指控它違反禁運的限制。<http://www.bloomberg.com/news/2013-...>
<http://www.theguardian.com/business...>

[4] 馬特·泰比，‘強盜銀行家：大到不能監禁。滙豐銀行是如何與毒販和恐怖分子勾結的。而且還能脫身，’
<http://www.rollingstone.com/politic...>

[5] IHT，‘滙豐銀行為洗錢支付19.2億美元，’2012年12月。

十月評論 2015年第2/3期

[6] 見 <http://www.huffingtonpost.com/2013/...> 及 <http://www.ianfraser.org/hsbcs-drug...>

[7] 試演部分：<http://www.youtube.com/watch?v=fKvG...>

[8] 史蒂芬·格林，事奉神？還是侍奉財神瑪門？，馬歇爾·皮克林，1996，137頁。

[9] 內德·西蒙斯，‘滙豐銀行：史蒂芬·格林被指控隱瞞醜聞。’英國赫芬頓郵報，2012年7月20日，<http://www.huffingtonpost.co.uk/201...>還有，前面提到的馬特·泰比文章，‘強盜銀行家：大到不能監禁。滙豐銀行是如何與毒販和恐怖分子勾結的。而且還能脫身，2013年2月14日，<http://www.rollingstone.com/politic...>

[10] “制止令”是針對一個人，公司或組織的命令，由法庭或當局發出，目的是停止它所認定的破壞或非法活動。這些命令的第一個在2003年四月發出，涉及銀行帳戶和資助恐怖組織，如基地組織。

[11] http://en.wikipedia.org/wiki/Bank_o... 是滙豐銀行在百慕大群島的官方網站 <http://www.hsbc.bm/1/2/>

[12] 史蒂芬·格林，良好的價值：反思金錢，道德和不確定的世界，格羅夫出版社，2010年，256頁 ‘一個人可以既是有道德的人又是厲害的商人？史蒂芬·格林，一個按立的牧師兼滙豐銀行的董事長，是這樣認為的’ <http://www.goodreads.com/book/show/...>

[13] 史蒂芬·格林聲明，他的部長職位薪水將免支付。他作為滙豐銀行首席執行官的收入為每年2千5百萬英鎊，而且他還有其他的生財手段。

[14] 見已經引用的奈德·西蒙斯文章，‘滙豐銀行：史蒂芬·格林被指控隱瞞醜聞。’英國赫芬頓郵報，2012年7月20日，<http://www.huffingtonpost.co.uk/201...>又見：《衛報》，‘格林男爵“遺憾”滙豐銀行的醜聞卻仍拒絕回答問題。貿易部長針對他主管銀行時發生的洗錢醜聞，打破沉默，’2012年7月24日。

[15] 郵報，英國貿易投資總署（UKTI）改革後，‘格林男爵退休，2013年6月19日，<http://www.telegraph.co.uk/finance/...> “總理說，前滙豐銀行老闆格林男爵做了“出色的工作”，讓政府重新聚焦於努力出口，推動了貿易協定，包括計畫的美歐貿易協定，並且有落實了“重要的投資”，包括重建巴特西發電站。”

[16] 獨立報，“滙豐銀行旨在提高125億英鎊，”2009年3月9日，<http://www.independent.co.uk/news/b...>

祭陳道同 熊安東

一九八〇年初，在鄭超麟家中，我與陳道同初次相識。鄭老介紹，道同是陳其昌的兒子，我肅然敬慕。道同自我介紹，一九五二年底在北京被捕後，在監獄裡與我的一位親如兄弟的初中同學張洪仁(巩一)，在一個小組同勞動同學習而認識。張洪仁常講起我的事，因此，道同說：“我早就知道你的名字”。這樣一來，立即拉近了我與道同的距離，像是舊相識重逢一樣地感到親切和高興。

道同與洪仁有相似的政治命運，他們都曾一度參加托派。抗日戰爭結束後，洪仁在瀋陽讀大學，道同在北平讀大學。一九四七——一九四八年，他們又先後踏上了中共領導農民戰爭勝利的船，並且分配了工作單位。經過嚴格的政治學習和思想改造運動，那時的政治要求是：歷史清白不等於歷史清楚。他們沒有扮演“二醜”(借用魯迅《二醜藝術》一文中對“二醜”的解讀)。他們都自認為參加托派，雖然與當時中共主張的新民主主義不相符，但最終的目的都是實現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因此，他們都向組織講清了各自的社會政治經歷，想跟著共產黨走。他們沒有想到一九五二年底還是關進了人民民主專政的監獄。他們都不忘，當他們被宣佈是反革命後，曾與他們友好相處的同事們，立即變了臉色，以敵視和仇視的目光看著他們被逮走。“沉舟側畔千帆過，病樹前頭萬木春”，對此，道同與洪仁有共同的感受，兩人結下了鐵窗友誼，這友誼延續了他們終生。因為他們早就主動交清了家史和個人從小到大的經歷，獲得從輕處理，判四年徒刑。一九五六年，刑滿釋放，剛剛三十歲出頭，在北京又被安置了新的工作單位。

自從與道同相識後，常在鄭老家碰到他。看望鄭老後，有時也順路來我家坐坐。那時他家住西康路，與我住處較近。多次交往中，我體會道同是個性耿直爽朗的人。他有獨立思考和獨立意志力。一九四六年他參加托派組織，是受他父

親生前的社會政治關係影響，被拉進去的，一九四八年初，他理性思考後，宣佈退出了托派組織。

陳道同的腿沒有受傷行走不便之前，他常去書店購書，曾代我買過好幾本書，或告訴我去買值得看的書。

從他父親時代就住的西康路地段拆遷改造，他家搬到七寶附近的一處規模大的新村，是他所在單位的建築公司承建，他分到一套較寬敞的住房。距離遠了，要換乘兩次公交車才能到達，等車和換車，來去一趟，都需要一個多小時。

他父親陳其昌遭日本憲兵殺害，壯烈犧牲，給他心靈留下了深刻難忘的傷痕，在他晚年的詩詞中多有發揮。二〇一〇年〈浪淘沙——思親〉下闕：“忠烈舞罡風/情繫蒼空/休說死去萬事空/西向行人多壯士/道與天同”。二〇一二年〈終點〉詩：“列車到站末一班/整理行裝擬過關/大限到臨且瀟灑/冥神有清應壯膽/母教命我休諛笑/父例示兒腰不彎/大步濶行雄偉志/有無生死入循環/”。二〇一四年最後一首詩〈新年好——讀“蘇聯史”〉的最後兩句：“且待讀完新史鑑/仰天含笑化雲煙”。仍然是想到他父親被日本憲兵殺害，現在仍不被列入烈士一事。且待讀完“新史鑑”，明白過去一邊倒向蘇聯時期所接受的政治思想宣傳的真偽。

我最後一次去看望他們是二〇一二年底。他的夫人葉阿嫂是位熱心腸的人，不僅周到地招待，下午還一定要陪我同乘要換兩次的公交車，送到離我家最近的一站，她才換乘下一班車回去。

二〇一三年我因多次住醫院，沒有去看望他們。二〇一四年初聞知陳道同肺癌晚期且已擴散，急着想去看望，遲至五月尚未成行，五月四日他病逝！兒女遵照他的遺囑，事後才告知親友。深感到一陣無言可喻的憂傷和悲痛！又逝去了一位坦誠相待的友人！

二〇一四年五月

斯大林官僚層把蘇聯帶往何處去？

托洛茨基著 史丹譯

1935年1月30日

蘇聯歷史翻到了新的一章。對於多數人而言，向基洛夫發射的一槍就像晴天霹靂。然而天空其實絕不晴朗。在蘇聯的經濟生活裡，雖然捷報頻傳 --- 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更由於它捷報頻傳，積累起來的深刻矛盾，已不可能單靠從上面而來的法令和命令將之消除，即使是緩和也不可能。與此同時，在官僚的管理方法和經濟文化整體發展的需要兩者之間，存在及其尖銳的矛盾。蘇聯在政策方面意想不到的恐怖行為，尤其是此起彼伏的審判，行政報復行為及接踵而來的，對黨進行的新一輪清洗行動，只不過是為一年半前便展開的總的政策性轉向，提供了富有戲劇性的外部形式而已。這個轉向的總的方向是向右轉，再往右，更進一步靠向右。

共產國際的致命政策，為社會民主黨背信棄義的角色作輔助，結果造成德國無產階級力量被粉碎，導致蘇聯加入了國際聯盟。官僚以其一貫富有特色的犬儒主義把這一行動作為至高無上的成就呈現於人前，並不是將之視為蘇聯在日益惡化的國際地位中被迫做出的必需退卻。在希特勒勝過德國無產階級的情況下，蘇聯工人和農民有必須要看斯大林勝過國際聯盟。在利特維諾夫的多次演說中，在其日內瓦的多次投票中及其多次採訪中，轉向的本質已經暴露無遺：蘇聯外交 假如談得上有任何勝利的話，那也

許就是它在無產階級公眾的輿論面前，把自己最後的一點顏面克制都拋棄了。在國際政策方面，階級和民族解放的所有標準被完全揚棄。唯一的一項指導原則就是：保持現狀！

與此，共產國際 --- 當然，是在沒有任何討論，也沒有召開任何承諾過的大會之下（而對於重要問題，大會又能幫上什麼忙呢？） --- 配合這一切，執行了在其整個歷史上最艱巨的轉變。共產國際從“第三時期”和“社會法西斯主義”的理論和實踐出發，一直走到與社會民主黨結成永久聯盟，還不僅於此，還與法國的國民政府的主要支柱，激進的社會主義者結成永久聯盟。為政權而鬥爭的綱領現在被頒佈為反革命煽動罪。同中國國民黨實行 附庸“同盟”的政策(1925 -27年)，順理成章地轉移到歐洲土地上。這個轉向持著完全同樣的一個目標 --- 維持歐洲的現狀！

在蘇聯經濟生活的氣氛裡，轉變的傾向並非不深廣。計劃在一開始就展顯了它內在的力量，但同時也指明了其應用範圍的局限。一個先行設定的一般性的經濟計劃 — 在一個具1 億7000萬人口而城鄉之間有著深刻矛盾的落後國家，尤須有之 — 是作業的假設而不是一道軍事法令，必須備受嚴苛的檢驗，並且在實施的過程中調整。必須採用

兩個杠杆調節計劃，財政和政治的杠杆：財政杠杆是一個穩定的貨幣制度，政治杠杆則是民眾中各有關團體對計劃中的不適宜性和分歧作積極反應的系統。可是人民的政治自主行動被遏制了。而在上次黨大會上，斯大林宣佈，穩定貨幣這種需要，是“資產階級迷信”。這一則快慰的格言和其它另外一則同樣大名鼎鼎的——關於“雙胞胎”法西斯主義和社會民主主義的格言一起，後來不得不作修正。

同是這個斯大林，曾經許諾過要把新經濟政策——市場——送去見“鬼”的，這事發生在多久以前？整個媒體曾經擊節歡呼，買和賣將會完全由“社會主義直接分配”取代的，這事到底發生在多久以前？消費者證曾經被稱為是這種“分配”的外在象徵。根據這種理論，在第二個五年計劃結束時，蘇聯貨幣本身已可轉變為代用券，就像劇院或公車的票一般。事實上，在一個沒有階級也不存在社會矛盾的社會主義社會中，既然是根據規定的計劃來分發產品，那麼真的還有容納金錢的餘地嗎？

不過，就在第二個五年計劃臨近結局之時，所有這些承諾越發變得黯然無光。今天，官僚發現自己不得不對那些“魔鬼”低聲下氣，請求歸還交給它保管的市場。不錯，根據藍圖，交易只有通過國家機器的機構才能進行。未來將表明，到何種程度上，這一制度將能夠得以堅持。假如集體農場從事交易，則集體農民也將進行貿易。要為進行交易的集體農民設定界線，以確定他何時越出

界線變成了商人，這事並不容易。市場有其自身的規律。

消費者證的制度，從麵包證開始，正逐步被取消。城市和鄉村之間的關係，日益由貨幣流通所調節。為此而要求一個穩定的chervonetz [黃金貨幣]。為了生產黃金，付出了龐大的、不無成效的努力。

為了有一個‘基礎’以計算工人和農民消耗的勞動能量實際具有的社會效用性和經濟效益，絕對有必要在特定的，社會主義發展的初始階段把經濟關係轉換為金錢的語言；唯有這種方式，才可通過調節計劃而令經濟生活合理化。

過去幾年裡，我們曾數十次指出，需要一個穩定的貨幣單位，這個穩定貨幣單位的購買力不會依賴於經濟計劃，但有助於檢查那些計劃。蘇聯的理論家們在我們的建議裡只看到我們迫切渴望“資本主義復辟”。如今他們不得不急切地再作自我教育。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有其優越點。

過渡到貨幣計算的系統所隱含的意義是，經濟生活中所有隱藏的和假面掩蓋的矛盾，都不可避免地、而且主要地轉換成響噹噹的黃金語言。然而，總是要有人來償付累積起來的誤判和失調。是會由官僚來償付嗎？當然不會，事實上，帳簿和庫房仍然掌握在官僚手中。會是農民嗎？但改革發生很大程度上是在農民的壓力下發生的，而且，至少在即將來臨的一段期間，將證明鄉村中的上層最有利可圖。買單的將是工人；工人藉以

維持生命的必需品將會作為代價，用以糾正官僚犯下的錯誤。撤銷消費者證直接和立即打擊的就是工人，尤其是打擊到收入最微薄、最貧困的部分，也即是絕大多數工人。

回歸市場和穩定貨幣制度（後者仍然在計劃中）的主要目的，是令集體農民對他們自己的勞動成果直接感到興趣的，從而消滅強迫集體化最負面的後果。前段時間的政策錯誤毫無保留的支配著這次退卻。然而，市場關係復蘇必然意味著強化農村經濟中的個人主義和離心傾向，增加集體農場之間、集體內部之間的差異，對於這個事實，我們絕對不能熟視無睹。

根據斯大林的報告，鄉村中的政治支部是作為超黨派和超蘇維埃的軍事化機器而設立的，其作用是對集體農場實行無情的控制。黨的報紙把這些政治支部歌頌成“領袖的天才頭腦”。今天，經過一年的運作之後，政治支部已偷偷地關門了，連關門大吉的通告也沒有怎麼聲張；官僚在“moujik”[農民]跟前退卻下來，由通過 chervonetz（銀行券，1924年由法律規定為基本貨幣單位，但從未實施過——譯注）組成的“smychlca”[聯盟] 取代行政壓力；而由於這個事實，強迫性的齊一化必須讓路給差別化。

因此，在臨近第二個五年計劃的結束時，我們並沒有把階級社會的“最後殘餘”結束，如那些欺騙人的、麻木不仁的官僚所許諾的那樣，而且正好相反，更是開始了階級分化的新過程。繼用行政手段消滅作為一

個階級的富農的偉大時代之後，隨之而來的，是落到了向“小康的集體農民”的富農傾向做出經濟讓步的程度。就在百分之百集體化運動搞得火熱的時候，布爾什維克-列寧主義者已經預測到了必不可免的倒退。季諾維也夫由於對實現百分之百集體化的可能性膽敢表達懷疑，被判處十年監禁（此外別無其他指控！）。但經驗證明了什麼呢？倒退已經開始。還不知道倒退到哪裡才會停止。斯大林官僚集團再一次表明，他們從未能夠預見到明天以後的事情。這是短視的經驗主義，是粉碎所有批評和思想下的產物，用骯髒的把戲來做自我欺騙，更糟的是，它施加在一個建設社會主義的國家之上。

而在新經濟政策——這是不在任何計劃之內的——能有機會表現出任何經濟結果之前，它便已招來了非常嚴重的政治後果。外交政策和國內政策的向右轉，無法不在無產階級中較有階級覺悟的分子間響起警號。他們的警覺更因生活成本的顯著增加而附帶著不滿。農民的心情依然不穩定和緊張。在這樣的氣氛中，還加上青年人的滿腹牢騷、尤其是接近官僚的那部分青年人，他們能夠觀察到官僚的橫蠻，特權和瀆職。就在這沉重的氣氛下，爆發了尼古拉耶夫的一槍。

斯大林派的報紙從反對派1926年的綱領立場，費盡心機地推論出1934年發生的恐怖行為。“[我們被告知] 反對行為必會導致反革命。”人們要是想從這句行文中找到什麼政治見解，它大約會變有如下這個意思：雖然這個綱領立場排除個別恐怖行動的想法，然而它卻會喚起批評和不滿，而由於不

滿情緒無法通過黨、蘇維埃或工會方面的管道得到宣洩，它最終將把那些不平衡的人導向恐怖行為。這樣一種假設確是會有真理的內核，問題是人們要知道如何把外殼去掉。眾所周知，批評和不滿並不經常導致恐怖活動和暗殺，只在矛盾緊張到了極點時，周圍的氣氛一觸即發，不滿非常普遍，而官僚握有擁有國家先進分子的咽喉，那些恐怖行動才會興起。斯大林派的報紙在“反對行為必會導致反革命”的這句格言之中，對斯大林主義政權提出了最無情、陰森的批評——這一次它道出了事實。

官僚對尼古拉耶夫一槍的回應，是對黨內和工人階級的左翼進行瘋狂攻擊。幾乎讓人以為斯大林一直在等待一個藉口，藉以對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和他的朋友們發動猛烈攻擊。報紙上發動了一場令人絕對難以想像的反“托洛茨基主義”運動，同 1924-1929年時全無二致。只消說這一點就夠了，《真理報》現在把托洛茨基形容為在內戰期間，在紅軍內部編織“反革命巢穴”的人；而不消說，把革命從這些“巢穴”中營救出來，是斯大林的英雄功績。在中小學、大學、雜誌期刊、人民委員會中，一再發現新“托洛茨基分子”，在許多情況下，是發現了落後分子。逮捕和流亡，再一次以大規模的面貌出現。大約有 30 萬人，即 15 至 20% 的黨員，再次從反復厲行清算的黨裡開除出來。這是否表示，布爾什維克-列寧主義者在最近一段時期內有那麼大的成就呢？這樣的結論言之過早。工人們的不滿無疑是增多了；對於左派反對派的同情也有增加。但官僚的懷疑和恐懼增加得更多更大。即使

連有誠意的投誠者，官僚現在也無力消受。官僚為了斬釘截鐵地向右轉，有需要把左方大幅截除。尼古拉耶夫的槍擊事件，給斯大林進行政治切除手術提供了外在的口實。

個人恐怖行動本質上是冒進性的；其政治後果是無法逆轉的，而且往往無法為其目標服務。尼古拉耶夫想要怎麼樣？這一點我們並不知道。很有可能他是想對黨的體制，對官僚政體的不受約束或向右轉的路向提出抗議。但結果呢？是官僚對左派和半左派的打擊，強化壓力和無法無天，對於不滿右傾轉向的所有可能者，施加殺雞儆猴的恐嚇。而無論如何，尼古拉耶夫的槍擊之能夠帶來如此不成比例的浩大後果，這個事實就是不可置疑的證言，說明了所有這些“後果”早已埋藏在政治局勢之內，只是在等待著爆發出來的理由而已。

官僚現在正進入為兩個五年計劃結算總帳的時期，它為此而趕在前頭保障自己。官僚已作好準備以向農民做出經濟讓步，即是說，向農民的小資產階級利益和傾向作讓步。但官僚不願意向無產階級的先鋒隊做出任何政治讓步。相反地，它反是向工人階級和青年學生中所有具有活力和思考力的分子實行狂野的員警突襲，以此來展開朝向“小康集體農民”的新轉向。

今天已經可以預測，隨著向左派實行的突擊攻擊，不久之後，早晚便會對右派發動突襲攻擊。它已經發展成蘇維埃形態的波拿巴主義的官僚中間路線，假如能夠使用其他

方式，而不必藉著"兩條戰線"持續攻擊 --- 也就是說，分析到最後，是向無產階級的國際主義和資產階級復辟的傾向進行攻擊 --- 而能夠得以保持勢力均衡的話，就不會是它現在的樣子。官僚政體的基本任務，就是保住自身。統治集團把它的敵人和反對者，或僅僅是不很可靠的那些朋友，分為左邊或右邊的"干預代理人"，這個分類，常常只依賴於對那團亂麻作方便的技術性處理而已。把上任農業人民委員長斯米爾諾夫驅逐出黨，是對右派發出的含蓄警告："不必高興得太早。記著你們也會這一天！" 無論如何，今天的矛頭則完全是指向左邊的。

在世界資產階級和改良主義面前做外交退卻；在國內小資產階級傾向面前做經濟退卻；向無產階級先鋒隊發動政治攻勢---這條三分論公式，就是斯大林波拿巴主義發展的新一章。這一章將會以什麼來結束呢？無論如何，結果不會是一個無階級的社會，不會是其裡面官僚的和平解體。與此相反，是工人國家再一次進入政治危機的時期。而帶著前所未有的無比尖銳性並隨而來的，不是過渡時期內的經濟制度的矛盾，雖然那些矛盾本身就極其深刻，而卻是官僚獨一無二的政治立場---- 這個獨一無二的立場不僅拒絕，而且是無法再向貧苦大眾的先鋒作政治讓步。斯大林主義集團成為了自己建起來的制度的俘虜，是國家連串政治動盪的主要來源。

政治、共產國際和經濟上的向右轉，到底能走多遠？他們將會為蘇聯帶來什麼新的社會後果？惟有在來臨中的年月對每個發展階段做出審慎估計的基礎上，才有可能

下判斷。在任何情況下，共產國際都已無藥可救了。共產國際完全敗壞的官僚層一步步墮落，它為了取悅斯大林派集團，徹底背叛了世界無產階級的最重大利益。但是，十月革命創造的國家是精力充沛的。強迫工業化與集體化的年代、暗無天日，人民處在鞭撻錐刺下，既產生了巨大困難也產生了偉大成就。當前的被迫退卻，一如往常，隱藏著新的經濟和政治困難。然而，即便在這個時候，也有可能絕對肯定地說，由官僚獨裁造成的政治危機，對蘇聯的危害，無可估量，同過渡經濟時期的所有失調和矛盾相比，它的危害更為直接更為尖銳。

官僚不僅沒有自我改革的願望，而且也无法改革本身。只有通過無產階級的先鋒隊對官僚機器，可以從上而下進行無情的清洗，才能將蘇聯國家恢復健康。但為了做到這一點，無產階級的先鋒必須挺立起來，去除等級，重新建立或者，更確切地說，重新創建革命的黨、蘇維埃和工會。它有足夠的力量達成這樣一項任務嗎？

蘇聯工人階級在數量上已經有了巨大的增長。同它的數量相比，它在生產作用方面的增長更加不可估量。蘇聯今天的無產階級具有巨大的社會份量。其社會組成的多樣性，其新一代缺乏革命經驗，黨的腐敗，還有世界無產階級持續的沉重失敗，造成了蘇聯無產階級的政治弱點。

在既定的階段，最後一個原因是決定性的。國際視野之缺乏，限制了俄國無產階級，使其把自己蜷縮在一個國家的軀殼內，容忍

著“一國社會主義論”，根據這一理論把國家官僚層神聖化。蘇聯工人必須再一次重拾對世界無產階級力量的信心，才能恢復對自身力量的信心。

當然，在蘇聯內部發生的各種力量之間的鬥爭以及克里姆林宮的搖擺不定，對於促進，或相反，延緩世界無產階級和俄國無產階級的結合有著無比巨大的意義。但決定蘇聯內部地位的主要關鍵今天已經處於蘇聯之外。倘若西方無產階級向法西斯主義投降而獻上歐洲大陸，處於孤立而且墮落深重的工人國家將無法長久撐持，但卻並非由於它必然會被軍事干預所攻陷；在不同的情況下，與此相反，蘇聯的干預本來可以把法西斯主義推翻的。但現在世界反革命的勝利已經把蘇聯內部矛盾的緊張程度推至最高點。藉著進一步削弱蘇聯無產階級的抵抗力而使法西斯主義進一步蔓延，從而令恢復生機的蘇聯制度取代墮落的波拿巴主義制度成為不可能。一場政治大災難將不可避免，接踵而至的將是生產資料私有制的復辟。

根據當前的世界形勢，“一國社會主義論”的這個官僚的福音，以其全部的民族局限性和誇大其詞的欺詐性立於人前。我們在此當然不是指在這個地區之內或其他地區之內建設一個社會主義社會的純粹抽象的可能性或不可能性 --- 這是一個留給學究的課題。我們腦裡想的是遠為迫切、具體、活生生的，歷史性的而非形而上學的質疑：處在帝國主義環境中的一個孤立的蘇聯國家，在法西斯反革命日漸緊縮的包圍圈內，有可能漫無休止地維持下去嗎？馬克思主

義的回答是：不。蘇聯內部條件的答案是：不。來自帝國主義的外部壓力，用於國防力量和資源的開支，建立正確經濟關係的不可能性 --- 這些障礙本身已是足夠深重了；但比這些因素更為重要得多的是這個事實，即：世界革命的失敗不可避免地會令蘇聯制度活性的承托人---無產階級---崩解，迫使其俯首順從在國家官僚的枷鎖下，而這個國家官僚本身，正被波拿巴主義的全部惡習所腐蝕。離開世界革命便不會有出路！

“悲觀論”！ --- 所謂的共產國際（Comintern）這一訓練有素的鸚鵡會如是說。那些早已告別革命與馬克思主義的御用騙子將發出嗥叫：“保衛資本主義！”至於我們方面，的確是完全不帶著“樂觀主義”來看待名為指導實為壓迫工人國家的斯大林主義制度。在歷史發展的所有可能變動下，這個制度要崩潰的必然性是同等的。然而唯有歐洲和世界無產階級走上進攻及勝利的道路，才能令蘇聯官僚無法把工人國家一同拖進窮途末路之中。首要的成功條件是，全世界的先鋒隊從斯大林主義死氣沉沉，遲鈍無能的爪掌中解放出來。儘管有強大的謊言和誹謗的機器帶來障礙，這個任務將會迎刃而解。為了全世界無產階級和蘇聯的利益，前進！

（譯自《托洛茨基文集1934-36章》）

革命者是如何形成的？

托洛茨基給一位法國同情者的信

1929年7月11日

親愛的帕斯同志：

在你寄來的連署函件裡---我肯定將會回應其中的大部分連署者（他們出於錯誤簽署了這封信），因此我的答覆就不用特意說明這封連署信的適當性 --- 你附上了一封私人信件，這就讓我有機會完全坦率地，暢所欲言地，以至於嚴厲地對你做出回答。

你叫我"老闆"，在冠以這個頭銜時，你認為你有權利來指導我。處處給我指示和指引。向我指出身為"老闆"應該有什麼樣的行為舉止，應該如何安排時間，應該放棄哪些工作，以便獻身給其他人，而這些人是由你指定給他的。也許你會允許我問一句：你意欲作為那個偉大革命任務的"軸心"，那麼你自己的時間和精力，是否也遵照這個任務來安排呢？因為你的信件來來去去只是著意於這一個問題：誰將是軸心？你同週報的決裂，你對這份週報所表現的敵意，你對古爾傑的指責，也都是圍繞著這同一個"軸心"而轉的。

我不知道我本人是否是"老闆"，也不知道我是否就是你認為合適的老闆。我寧可認為自己不是。就我與我的朋友們，以及我和我的敵人們的關係來說，我在革命事業之外別無其它考慮。個人偏見於我是迥然陌生的。我已經說過很多次，我希望《反潮流》能成為週報。在君士坦丁時，你就這個計劃只提出了財務方面的對立意見。你告訴我 --- 那不過是確證了我已

十月評論 2015年第2/3期

經知道的事情 --- 《反潮流》費用是由俄國反對派組織所提供的金錢來維持的，而隨著這些資金的耗盡，讓《反潮流》繼續作為週報出版會有困難。這種說法讓我覺得奇怪。我不能理解。我對自己說："這是隨口而出的說話。我不該誇大這句話的重要性"。你提議出版半月刊，我不得不接受它是正確的。可是這對我來說(在你也一樣)不過是一項臨時的措施，是在外國維持兩個月或三個月的事。在實際中，所作的決定是出版一份週報，並期望它發展成為日報；這點甚至記錄在你的筆記本裡了。可是你所做的，離日報或週報甚或半月刊遠得很呢。現在的《反潮流》較之過去更是一部俄國檔的文集。人們從這份報章裡不能得知法國的運動。我們在群眾工作方面也做出了其他一些計劃。可是什麼也沒有落實。我從《反潮流》中看不到有一絲的群眾工作的目標。而就在我耐心地等待了四個月後，在我堅持我們必須從關閉的大門後面現身出來之後，你只是拿出關於特蘭和蘇瓦連的故事來作答，並且在四個月之後，你向我呈現你的筆記本裡的一些摘錄為你提出的史實作辯護。可是這種作為是法律公證人的作為，而不是革命者的行為。而這正是關鍵所在。我們的朋友為了出版我們的俄語版權而付出了他們的所有；他們對事業作出了為事業作奉獻的人們所能作的全部犧牲。至於在巴黎，則是不可同日而語。為了出版一份週刊，它全部的要求不過是次等的，無傷大雅的犧牲：犧牲掉時間和金錢。你展開工作，做了一個好榜樣，你便開始向他人提出要求 --- 因為你有權

以共同事業之名提出要求。可是你一開始就聲稱缺乏財金基礎，然後就把這種缺乏的論調“深化”，你使一個缺乏的論調越發缺乏。到此為止，所有說過的話，做過的事，全是廢物，全都行不通。我們必須等待你的小冊子出來，才可做些“實在”的事。啊呀，不必厚顏無恥地惺惺作態了罷，假如你不是讓自己落到這種岌岌可危的局面，不必用不惜一切的代價來尋找一個見得人的論證的話，你便不會動用這種聞所未聞的辯白了。

你對那五個“從君士坦丁堡獲取啟示”的同志，窮盡詞彙，都覺得不足以表達對他們的輕蔑之意。這種挖苦既出格又下流。這些同志，儘管為了謀生而汲汲營營，他們卻是在非常艱難的時候，主動自發地冒著風險到君士坦丁，來這裡幫助我們。他們給與我的幫助，其價值無可估量。所有這一切都正當得宜。但是這個故事還有另一面。我在經過對他們作近距離的觀察之後，對自己說，像這樣能夠採取主動性和做出這種個人犧牲的同志，就是革命者了，又或是能夠成為革命者的；因為，巴斯同志啊，革命者正是這樣形成的。可以有知識或無知、聰慧或平庸的革命者，但卻不會有缺乏闖破一切難關、缺乏獻身精神和犧牲精神的革命者。我沒有看錯。這些年輕同志表明他們完全準備付出他們的時間，力量和所有以出版一份週報，並會發動其他人加入。就這樣，他們進行他們所允諾過的工作，而你卻是破壞他們的工作，不是幫助他們。這當中的原因，來來去去都是那個“軸心”問題。

可是，必定會在各方造成影響的運動裡的一份週報 --- 它最終要成為一份日報 --- 這份週報在你的想像中佔有什麼位置呢？你是否相
十月評論 2015年第2/3期

信，這項任務難道能夠從十分忙碌的法律事務所騰下的餘閒間，挪出一鱗片爪的時間來完成？你是否相信，你能夠隨興地打理運動，或甚至是打理一份和運動有關聯的週報，就像你隨興地打理一項次要的任務那樣？對於革命軸心，我有不同的見解。我相信，一位管理一份工人報紙的人士，必須全力以赴，只有一項任務在身；尤其對於像我們這樣負有重任的人，更應該如此。自從你來過君士坦丁堡，我首次從你本人的口中得知，你是一位非常忙碌的律師，從那時始，我便無時無刻不想著這個問題。可是我告訴自己，因為你想要管理這份週刊，那麼你自然要作出必要的結論。而由於我並不把我們的關係看成是老闆和奴隸的關係，我便沒有向你指出你應該怎樣在革命與法院之間分配時間。我假設你會知道，赫斯當年希望成為德國黨的軸心的一分子時，他發現有必要放棄他在柯尼斯堡的律師執業。在耶拿市的大會上，許多人 --- 其中甚至包括了倍倍爾 --- 對赫斯在年俸 3 萬馬克方面所作的犧牲讚美不已。我們俄國人 --- 我本人當時在場出席了大會 --- 對這些讚揚相當不快；在我看來，那是十足的小資產階級。我在其中一次發言裡甚至談到這件事，將它作為德國黨已缺乏革命精神的說明。然而，赫斯並沒有為革命局勢和事態的急轉直下有所準備。

關於俄國黨在非法工作時期的記錄，我不作評述了。委身運動的人，不僅在物質方面委身，同時更是傾心傾意，捨身不顧。他公開認同他所為之效勞的事業，我們就是通過這種教育過程，創造了眾多的成為無產階級革命“軸心”的戰士。

巴斯同志，我坦白說，甚至是嚴厲地直言，

為的是挽救仍能挽救的東西。局面已經過於嚴重，再不是說客套話的時候了。我不是一個狂熱分子，也不是個宗派主義者。我很理解沒有脫離他的社會背景但同情共產主義事業的個人。這類協助對我們可以是非常寶貴的。但是這是一個同情者的幫助。我在致美國朋友的一封信件上討論了這個問題。伊斯特曼曾經寫信給我（他的信沒有客套的言辭）道出了如此這般的個人處境。他把自己稱作“同路人”，用他自己的話說，他並不追求在反對派運動中擔任任何的領導角色，從旁協助已讓他心滿意足。他做翻譯，把屬於他的版權給與【美國】《戰士報》等等。為什麼？就因為他不能把自己全身獻給運動。而他的做法是正確的。

你必須明白，一個作為“軸心”的人，也就是說，革命運動中的領袖或其中的一個領袖，是有權召喚工人作出最大的犧牲，包括他們的生命。既有所權利，也要有不下於同樣分量的承擔。否則，每個聰明的工人勢必會問，“某人號召我作最大的犧牲，但其五分之四或三分之二的時間，卻被他用來確保他本人的資產階級生活而不是確保我的勝利；這表明了他對於迫在眉睫的革命沒有信心”。而這位工人的想法應是正確的。

請把綱領放在一邊！不關綱領的事。關乎的是整個革命行動。馬克思曾說過，運動前進一步，勝過綱領十部。而馬克思至少同你我一樣，是綱領甚至宣言方面的能手！

總括來說，你的信，而更主要的是你政治態度，向我表明，共產主義對你來說，是一個真誠的想法，而不是你生命中蓋過一切的信念。然而這種觀念仍是非常抽象的。現在的時刻，

你有必要（很久以前就已經有這個必要了）採取行動，一個推你走向真正目標的行動，這時你便由於雙重行為標準而發乎本能地予以反對。當你被邀請參加出版工作的時候，你回答說：“沒有資源，而且人力不足”。還有，當別人著手尋找資源和人手時，你則說：“假如我不是其中的軸心，我便反對。”你的所作所為，真是聞所未聞，哪怕你對週報沒有信心，你也應該靜觀其事，而不是加以破壞！你對這些事情全無經驗，但你卻盲目的一直走向新的困境！明天，你會擺出理論方面、哲學方面、政治方面、以及語言學方面的分歧來為你的立場作辯護。事情將要怎樣結束，並不難理解的哩！假如你不想進入【編輯部】名單，請保持靜觀，採取友好的中立吧，不要僅僅出於你個人的理由，做一個無原則的反對派，那個場面可悲呵。

為挽救我們的政治友誼，致以最大的願望。

L.托洛茨基

（譯自（《托洛茨基文集 1929年》）



知識份子和黨的環境 托洛茨基著 (1937年12月21日)

親愛的吉姆：

謝謝你就“B”案例做出解釋的信件。我曾把上封給他的信的副本寄予你一份。那並不是正式的邀請信邀請他來這裡，而卻是向他表達我個人對他感到興趣及對他卓越的智識才能的賞識。我不相信這樣的一封信能造成偏見。在俄國黨內我們也有過同一類型的代表，例如，那三個歷史教授、波克羅夫斯基、羅日科夫和切拉斯科夫。羅日科夫從布林什維主義走到孟什維克主義。切拉斯科夫現在法國與克倫斯基一起。波克羅夫斯基死時是斯大林派，但在他死後，則被斯大林主義者自己掃地出門。他們加入黨時各有不同的背景經歷，而不是年輕人一個；他們並且從未能夠完完全全的適應黨的環境。列寧曾經排除萬難，費過無數努力以把他們挽留在黨，克服了所有困難，為他們找到足夠的位置和工作。在波克羅夫斯基方面，他至少成功了。波克羅夫斯基是三人中最重要的一員。

難道你不相信“B”可以專注於《新國際》，並擔任黨在科學宣傳方面的主腦，包括指導高級黨校的工作嗎？並且，倘若把他也推介到國際方面的工作去，以讓他和各個不同支部的領導同志有較多的直接接觸，大概也不錯。國際會議或新的國際書記處應該就制定第四國際的綱領，指任一個委員會，而這個委員會的成員應包括我和“B”。他可以趁著假期來我這兒，以便與我一道編寫委員會的第一份草案。這便

會讓我們有可能充分地、密切地討論革命運動中所有理論性和實踐性的問題。我相信，通過上述所勾勒的種種措施，我們可以在這段適應新環境的困難過程中對“B”有所幫助。我們務須盡一切努力，以便為我們的運動挽留那麼一流的力量。

委員會的裁決給斯大林主義者的打擊是巨大的。不管杜威博士與其他自由主義者有多麼的保留和反對，無產階級先鋒隊將是下一個時期的最先受惠者。我們的美國同志完成了一項宏偉的工作。

在現時，保護蘇聯內外的斯大林受害者這個問題，仍然迫切緊要。我不知道就保衛委員會的問題所作的最後決定是什麼。不管它是解散還是改變，我們務須立即有一個有著長遠展望的新委員會。我讀到你就羅賓遜案件所作的出色備忘錄。這個案件再次表明一個常設的調查防衛機構的必要性。

向羅絲和你致以最美好的敬意！

韓森 [托洛茨基]

譯自（《托洛茨基文集1937-38年》）

訪托洛茨基 II：防衛組織和對待知識份子的態度

1938年3月24日

托洛茨基：我同意加農同志的說法，就是我們必須立刻動用我們手中的力量，動用那些我們信任的力量，不能依靠動搖份子；這麼一來，那些週邊團體和自由派們便必須做出選擇，那時甚至連我們那位了不起的朋友索洛也將看到，他在政治上是獨夫一名。倘使我們成功---我們將會取得相當的成功---我們在不久之後便會把那些猶豫不定的份子爭取過來。我們現在就可以絕對肯定的知道，假如我們和費達·柯奇韋這類份子搞成一堆---斯大林派將會施加壓力，較諸保衛委員會期間更甚---這些份子將會在最關鍵的時刻，比如說，在戰爭時期，當我們的同志需要保護的時刻，把我們出賣。此所以，這個委員會必須是一個教育的機構，它善擇成員並對他們做出考驗。這個委員會與那些在和平時期是和平主義者，在戰爭來到時，便紛紛主戰的自由主義者，不能有相近之處。

聆訊期間，我們在這裡討論了這個問題---當然，我們必須承認，儘管在關鍵時刻出現了逃兵，保衛委員會仍然成功地完成了其任務---當時，我堅持認為，絕對有必要用工人組織包圍該委員會。即使我們只有200個這種工人，也強於1,000名知識份子；假如這些工人通過其代表與[蘇珊娜]拉福利特或索洛之流打交道；那麼這些人的行為便不至於那樣反復無常；工人們會管教他們。我們自己的同志應該加入組織，加入來自工會的同情者中。每個自由主義者在和工人會晤時都是有點兒含羞答答的。至於與洛夫斯通份子的交手，我們且放開他們，讓他們聽天由命吧。對索洛，我們可以說："你既然不滿足於和我們一道，那便創立你自己的委員會吧，屆時我們便會和你組成聯合陣線---假如你有能力自行創造一個委員會的話。"

沙克曼：事實是，他們寄給我們的信件是很有趣的---這封信有十二個連署人---並且有意義非常重大的東西。他們提到了NPLD (NonPartisan Labor Defense中立勞工十月評論 2015年第2/3期

保衛組織)，在我們加入社會黨(SP)時，NPLD與社會主義勞工保衛組織合而為一，他們聲稱說：因為你們退出NPLD，從而令這個組織瓦解。

加農：是啊，索洛威脅說，他要向《現代月刊》告發我們。

托洛茨基：《現代月刊》？我相信，遵循一個堅定的政策，你們甚至能夠把索洛爭取過來。

沙克曼：關於如何對待作為一個整體的知識份子這個問題，我們看到了你給拉夫的回信。我們正在討論黨對激進知識份子的態度及關係問題。最大的困難乃在於他們沒有同質性。他們不是一黨：有像薛尼·胡克那一類人，他是十次有九次贊成黨的。他的歧見在哲學領域；胡克在委員會內捍衛我們。有趣的是，在一些細節處，即使他不同意我們，但他仍為我們說話。也有些知識份子，同共產黨決裂，讓他們經歷到一些挫傷。另也有一些個別的知識份子，像諾瓦克和莫羅，他們參加黨，成為黨的一員；但是這類人十分罕見。其他知識份子以索洛為代表。還有一些知識份子，他們有時與我們共進退，有時則不，但他們也參與了呼籲成立保衛組織號召的連署，像[占士 T.]法雷爾就是這類人。

我們應該盡多少努力以使他們站在我們的立場上說話？在多大程度上讓他們與我們在雜誌上合作？假如他們與我們合作，那麼容許分歧顯示的限度又在哪裡？還有，我們與他們的刊物如《黨員評論》該有多大程度的合作？

幾乎可以肯定的說，隨著斯大林主義運動勢所必然的解體，共產黨裡較好的份子，是會趨於投向我們的。我們應該採取什麼樣的態度以令他們接近我們？前幾天，加農就《新國際》提出了一個疑問，而我也同意這個疑問的，就是：把《新國際》的篇幅從三十二頁擴充到

四十八頁；新增加的篇幅闢設文學部分——並不是刊載詩篇，而是刊載文學批評，書評，對其他雜誌的評論。並且，把這個部分交由法雷爾，拉夫和[占士]羅蒂這類份子編輯，這種做法是否行得通，正確和可取呢？這樣，就能夠把像他們的那種人拉近到黨來，而且同期刊較為政治性的部分相比，使他們有更加寬裕的空間以表達不同的見解。這麼的一種做法，是否會趨於把《黨員評論》這類雜誌取而代之，或是另闢蹊徑與《黨員評論》並行運作，而後面這份雜誌正在靠近我們？他們所代表的與索洛份子不同，索洛正在離我們而去，而他們所代表的則是曾經與共產黨一起而現在正在走近我們的份子。

托洛茨基：我相信，最好的情況會是《新國際》與《黨員評論》之間分工。允許馬克思主義的業餘愛好者進侵到《新國際》內，哪怕只涉及到文學問題方面，是不會免除相當程度的危險性的，因為黨將會要為他們的集團、他們之間的小齟齬和摩擦等等負上責任。把這些東西引入《新國際》去，是頗有點危險和妥協的。另一方面，能把《新國際》作相當的擴充，不一定要用八至十二頁，至少要有，並非用於文學方面，而是用以注視工人運動中的意識形態方面的事態，都會是非常好的。雜誌比比皆是、有德國雜誌、馬克思主義或半馬克思主義的雜誌，若論及它們並且做出批評就很好。對我們來說，這比文學批評更為重要。

《新國際》必須含有可以引起工人運動興趣的一切事物。可是挪出整整十二頁來給文學會是危險的，尤其是我們給與自然科學、工會運動和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篇幅太少時。若是與《黨員評論》建立起合作，對他們作友好的批評而又不替他們承擔責任，會比較好些。許多知識份子寧可依附于《黨員評論》而非《新國際》，而我們將可把《黨員評論》視為儲備，不時把一些人吸引到黨來。

趨向我們的運動，尤其是來自斯大林派的人，如果來勢迅速的話，則我們必須設立六到十二個月的察看期；對工人毋須要察看期，但對知識份子就至少是六到十二個月。再就是給他們特定的任務。例如，我們爭取到一群十五人的工會份子，那便把知識份子安置到工人處，

讓他們一起工作，讓知識份子為工人尋求材料、統計數字等。但知識份子在工人的會議上只有諮詢性的聲音；是知識份子被我們的工人成員教育。假如工會工人說那個知識份子派上用場，沒有自命不凡，那麼我們可以接受他入黨。我們若是要有一個工人黨，我們便要讓知識份子感到，能被我們的黨接納是很偉大的榮譽，而且只當他們是被工人核准才會受到接納的。然後他們才會明白這不是一個知識份子小資產階級的黨，而是工人運動的黨，這個黨為其目的可以不時地使用他們。否則的話，我們便會被知識份子入侵，而假如種種討論是由來自斯大林主義者的知識份子展開，工人便會避開我們的黨。我們必須為來自其他政黨的知識份子建立嚴格的規矩。我們對待同情者可以有十分彈性和自由的政策；我們可以派出代表到他們的編輯委員會；我們可以接受他們中最優秀的人來我們的報章工作，為《呼籲》工作，如果這份報紙要每週出版兩，三期的話。但要讓他們保持獨立；對於要加入我們黨的知識份子，要採取非常嚴格的態度。假如涉及的是一個已經在我們運動中的知識份子，那就是另一回事；工人也是另一回事；不過，一個受過斯大林主義黨教育的知識份子，對我們卻是危險分子。

與此同時，我們必須無情地抨擊像麥斯·伊斯特曼和尤金·里昂斯的那種人。我們必須向他們表明，對待諸如馬克思主義理論這類事情，我們是非常認真的，而且，我們不能允許造成這種印象，即麥斯·伊斯特曼既可以是我們的朋友而同時又湊巧是社會主義的敵人。

還有，我們的青年組織在學院內有青年知識份子的核心小組是很重要的。我們可以希望美國會產生最優秀的馬克思主義者。危機將使美國青年思考，而美國青年會產生最優秀的份子。這種核心小組的成員不是黨員，但我們可以予以審視，篩選，把新一代的馬克思主義者爭取到我們的運動來。大部分的老一代人都被斯大林派搞壞了，至於那些直至今天仍然容忍斯大林主義的人，則沒有多少批評性。老一代已經心灰意冷，我們必須從年輕人開始。

鄧尼：像裡斯頓·渥克這種人又如何？

托洛茨基：他現在哪裡？

加農：他試圖做個獨立的激進分子；他到

處講演，到處發表文章。

托洛茨基：我們的報章最好是給他閉門羹。

沙克曼：棘手的是他找上門給我一篇文章，要求刊登在《社會主義號召》。我便拿起了《先鋒報》，看他們的一篇文章。

托洛茨基：對，我們應該同他們切斷聯繫。我們對奇里加也是這麼辦。你們知道他與我們的《俄文通告》合作，然後又跑到孟什維克派那邊，我們便立即與他中斷關係了。

卡爾斯尼爾：在我看來，對於這些人，我們該有些什麼，比如週邊組織之類。

托洛茨基：是的，他們可以在NPLD這樣的組織內工作。即使我們拒絕他們的文章，也可以向他們解釋，工人報刊的報人應該是個導師。假如他自己沒有一個思想綱領，他又怎麼能做導師呢？他假如想在NPLD之類的運動中幫上忙，這很好，但他不能在報章幫忙，在他知道自己的道路之前，他不應擺出一付導師的模樣。就算我們因這種措施而失去一、兩個人，但許多其他人將會因此而受教，而他們會變得更認真。

加農：在組織方面，我們現在處於較佳的位置，能實行更為堅定的政策。當我們仍是一個微小的組織而共產黨仍未解體，社會黨似乎走向左邊時，我們便沒有那麼有利的位置。現在社會黨已經斃命，洛夫斯通運動無法擴展，其餘所有試圖打擊我們的宗派團體亦已完蛋。在整個反斯大林分子的戰場裡，我們現在毫不含糊是確定的領導人。那些向來疑慮到底是工人黨還是社會黨能夠長存的人，疑慮到底是費德分子、厄尼爾分子還是我們能夠長存的人，都知道一切塵埃已定。此外，我們有青年運動這個意義至為重大，最有前途的運動。洛夫斯通運動和社會黨皆沒有青年運動。

托洛茨基：我們從共產主義青年團方面得到新的追隨者---這具有最大的歷史重要性。

加農：我們的青年有極大的自信 --- 斯大林主義者前所未有地更為處於守勢。

托洛茨基：我不瞭解我們青年組織的結構；有必要設一個知識份子和學生部，還要為工人設立一個組織。

沙克曼：我們的青年主要是學生；現在就如何接近青年工人的方式和手段，在進行熱烈討論。就這個問題，我不同意吉姆的只有一個點。不錯，洛夫斯通運動本質上是一個紐約的運動。不過，他們的運動顯然在增長，雖然不大：他們在費城的“共產主義青年陣線”曾經有十五個成員。由於他們與荷馬·馬丁的合作而在底特律有一個小組，他們在政策上正在經歷有趣的轉向。他們現在談第三國際的死亡。他們正在跟整個布蘭德勒運動一起向倫敦局靠攏。

在我的想法裡，毫無疑問，洛夫斯通運動在紐約的工會中有一些十分重要的地位，遺憾的是，比我們的更重要。不錯，它局限於針織行業，但有相當大的影響力；我們則沒有。洛夫斯通運動召開一次會議，他的人針織行業吹一下風，就有幾百人來到。

我們的同志報告說，洛夫斯通運動的基層同志對我們有了較為友好的態度。其中一人說：“我們現在不支持共產國際了。我們反對莫斯科審判；我們為什麼不來一個聯合組織呢？”你當然明白，我並非提議聯合組織；那人的說法只不過是他們基層感受的外露罷了。我們仍然是更為強大的；我們在我們的青年運動中，我們的成員中，我們的運動中，比他們更為強大。問題是在於想要爭取他們的一些基層份子到我們的組織來。沃爾夫來參加我們的集會這個事實，具有非常重大的意義。

〔談話到此討論到斯大林派基層方面做工作的問題，而這又聯繫到俄國問題的方面。參見“訪托洛茨基談俄國問題”〕。

譯自（“托洛茨基文集1937-38年”）

史丹譯

Release Immediately Pu Zhiqiang and All Innocent Imprisoned Dissidents! Zhang Kai

In May 2015, the well-known human rights lawyer Pu Zhiqiang was arrested after he participated in a seminar on the 25th anniversary of June-Fourth Movement at his friend's home. He spent 19 months in prison. Later, he was charged of "inflicting racial hatred and causing social disturbance", due to his postings of criticisms on Chinese officials and policies on Weibo. The court stated that the verdict would be accordingly released after 3 hours of hearing. Pu did not plead guilty. This shows that the authorities deprive people's rights of freedom of speech.

Pu Zhiqiang should be released unconditionally and immediately. It has been too long to get him imprisoned for 19 months. Under the pressure from international and domestic human rights lawyers, the authorities at last stated that Pu was given a suspended three-year prison sentence. Pu said he would not appeal. However, he has not been released yet. That means that he may be sentenced to prison due to any accused misbehaviors.

Another case is the famous journalist, Gao Yu. The court convicted Gao of leaking state secrets, and gave her seven-year prison sentence. She has suffered a lot, as she is 70 years old and has serious illness. With the medical document issued by the hospital, she was given a 3 to 5-year suspended prison sentence, which will be conducted outside prison. Nonetheless, she has not yet regained unconditionally her freedom.

In the Christmas of 2009, Liu Xiaobo, a human rights defender who drafted "Charter 08" and Nobel Peace Prize Laureate, was charged of "inciting subversion of state power" and was given 11-year prison sentence. He has suffered for years in prison, and his wife, Liu Xia, is forcibly detained at home, so she has no contact with the outside world. Liu should be released immediately as well. The old cases have not been settled, meanwhile, there are new cases. Guo Feixiong, a human rights defender from Guangdong province, was firstly charged of "disturbing order in public space", and then of "causing social disturbance", so he was sentenced to 6 years in prison. He is actually innocent. It only proves that the court is an absolutely obedient servant to the authorities.

After taking supreme powers of the CPC, government, and military, Xi Jinping immediately restricted democratic rights outside and inside the CPC. Through 14-month revision of "The Regulation of the CPC on Disciplinary Actions",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PC announced to ban freedom of speech and press freedom. For example, Zhao Xinwei, the secretary of CPC of *Xinjiang Daily*, the editor-in-chief, and the deputy director of the press, was not only expelled from the CPC and the press, but also being prosecuted by the court, for 'improperly' discussing government policy in Xinjiang region. Similarly, Zhao Guoming, head of the region's poverty-relief office, was also prosecuted for seriously violating political disciplines (3 November, *Ming Po*).

According to another news report of *Ming Po*, the mouthpiece of the Commission for Discipline Inspection of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PC disclosed that a deputy director of the public security bureau of a city who commented on the policy of "one country, two systems" among the circles of Weixin, was punished politically due to his violation of the provision of "any cadre is forbidden to comment freely on the core policies of the CPC" of the newly revised regulation. There are many examples to prove that the CPC practices centralism but not democracy. It violates the principle of democratic centralism which Lenin upholds.

Outside the CPC, freedom of speech is further restricted. If any netizen spreads "false news" among the internet social platforms such as Weixin or Weibo, he will be convicted of criminal law. The longest prison sentence is 7 years. This may lead to wrong cases of "literary inquisition", such as Xin Lijian, an out-spoken internet commentator, was interrogated by the police. Hong Kong is also affected. For example, Wang Jianmin, a former senior commentator of Asiaweek, and Guo Zhongjiao, its editor, published political magazines, i.e., *Xinweiyuekan* and *Multiple Face* in Hong Kong, and then were arrested due to "illegal operation". They were prosecuted after one and half year of detention. Wang has two more charges of "bribery" and "cover bidding". This shows that the authorities are determined to send Wang into prison.

Yao Wentian, the owner of Hong Kong Morning Bell Press, published many books about the dark side of the CPC. Last year, in Shenzhen, he was sentenced to prison for 10 years, charged with "smuggling chemical raw materials". All these show that the CPC suppress press freedom in Hong Kong through literary inquisition (5 November, *Apple Daily*). This openly violates the Basic Law which guarantees Hong Kong people to enjoy freedom of speech and press freedom.

According to 2014 Annual Report by Reporters Without Borders, China was the top one country which sent the largest number of reporters and internet media workers into prison. Recently, another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claimed that China is still the country which sent the largest number of reporters into prison in 2015.

Again, the above cases show the CPC's barbaric bureaucracy and autocracy!

22 December 2015

Comments on the 13th Five-Year Plan on National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Zhang Kai

The CPC Central Committee's Proposal on Formulating the Thirteenth Five-year Plan (2016-2020) on National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was adopted at the Fifth Session of the 18th CPC Central Committee. China pledges to build a well-off society. It aims to double its 2010 GDP and the 2010 per capita income of both urban and rural residents by 2020, which require a 6.5 % annual average growth in the next five years. The poverty of 70 million of rural poor population will be alleviated accordingly.

However, in recent years, China's economic growth is gradually slowing down, due to many international and domestic constraints. Other countries like Japan, Russia, and Brazil are also encountering the same economic recession. It seems that China cannot even achieve 6.5% annual average growth, hence, the goal of building a well-off society will become an illusion.

Five concepts of development

The Proposal summarized its latest 5-year plan with 'Innovation', 'Coordination', 'Green', 'Opening up', and Benefit-sharing'.

The most difficult part of building a well-off society lies in rural areas. If China needs a balanced development, it should coordinate well both urban and rural development. Public services can be extended to the countryside in order to enhance its living standard. Unfortunately, the CPC policy always sacrifices rural society and exploits peasants. Now the document vows to make a balance, in that poor rural areas will receive more national public fund, and peasants will share more public resources. It comes true only if the policy can be implemented in reality.

Shortly afterwards, the CPC Central Committee issued a Communiqué which claims to adopt green development policy, to take a path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and to promote beautiful China. It also suggests to set up main functional regions for the protection of national land development, as well as to install systems of management and supervision in th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organizations under the provincial level.

"Green China" is like a castle in the air

Xi Jinping claimed that ecological problems like serious pollutions of air, water, and soil became barriers of building a well-off society. People desperately need to overcome these ecological problems. It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missions of the 13th Five-year Plan. Nevertheless, Xi pointed out four difficulties of tackling environmental problems: first, supervision on local governments and involved sectors; second, interference into law enforcement of environmental organization by local conservatism.....

Why is the central government unable to fulfill the responsibility of supervision on local governments? This is because the CPC has long adopted capitalist market economy. Many officials have become privileged, money-minded, and corrupted. So it is difficult for the central government to enforce the law at the ground level. Xi speaks out the inconvenient but widespread truth.

Ironically, after the announcement of the Communiqué which claims to carry out the strictest environmental policy, the residents of Boyang Lake, the largest freshwater lake in Jiangxi Province, China, went to demonstration, against pollutions caused by chemical plants which were supported by local government. There were nearly ten thousand demonstrators on the streets. The police suppressed the demonstration with batons, tear gas, and even shot the masses with riot guns and rubber bullets. Many people were wounded. What Jiangxi provincial government did was smearing the Communiqué (5 November, *Apple Daily*).

This again revealed that local officials conspired with chemical plants for profit-making, which led to environmental devastation. The chemical plants caused pollution problems through gas emissions into the air, waste effluents into the river and farmland. All these have endangered people's livelihood and have caused health problems. However, the local government turned a blind eye to that issue.

In addition, it is hardly to install systems of management and supervision in th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organizations under the provincial level. According to *Wen Wei Po*, dated 2 November 2015, the headings were "Smog swallowed Beijing, day was night, people cried out: all eyes, noses, and throats were in pain". The phenomenon was nearly the same with the fatal smog in London of 1952. Now, Beijing, Tianjin, Hebei Province, among others, are trapped in smog. This proves that PM 2.5 is very serious in those areas.

“Benefit-sharing” may be like an illusion

In order to fulfill the fifth goal of benefit-sharing, the document determinedly makes concrete instructions and timetables. As Professor Wang Yukai remarks, the fundamental issue is how to make five levels of governments put the ideal policy into practice. In other words, it means it is impossible to carry out the policy one level by one level.

Professor Wang argues that China has great achievement of reform and development, but people do not share the fruits. This has led to an enlarging gap between the rich and the poor, income disparity, and regional unbalanced development. Social conflicts and riots were widespread. Put simply, the last several decades of development did not bring social justice to all Chinese people, and wealth is concentrated in a few hands. He analyzes that wealth is concentrated in governments; wealth is concentrated in capitalists; and wealth is concentrated in monopolized enterprises. The three kinds of wealth concentration led to disparity between rich and poor, as well as social confrontations. People cast doubts on government policy which claims to uphold social justice. The key question is: can we let all people enjoy the fruits of reform and development?

China has adopted capitalist market economy for more than 30 years. The unjust wealth concentration is the outcome of the logic of capitalist development which cannot be changed by any personal will. It can be corrected only if we build the real socialist and communist systems which guarantee social justice and wealth distribution. Nonetheless, it is impossible for today's China and its capitalist system to do it. The Communiqué proposed some solutions. However, people in charge of wealth distribution may take advantage of this progress.

The Communiqué also proposes to improve the health care system, to control price of medicine, and to reform insurance policy, in order to build a modern basic health system and hospital management which can cover both urban and rural areas. Although the existing medical system can be guaranteed in the city and the countryside, the standard is low. China is still struggling to construct a medical system with high-level standard.

Two-child policy

The Communiqué also proposes to implement two-child policy, in order to address the problem of aging society.

The CPC carried out the strictest one-child policy during the 1980s. One couple is allowed to have only one child. There were horrible slogans such as “Beat it. Abort it. Kick it. Absolutely not to deliver it”, “We want to have ten graveyards rather than a baby”, “Give you a piece of rope to hang, give you a bottle of poison to drink”. People who violated the policy were seriously punished, so did rural officials who failed to enforce the law.

According to *China Health Statistics Year Book 2010*, since China adopted one-child policy, the number of abortions reached 275 million from 1980 to 2009. The highest number was 14 million in one year, the lowest around 6 million in one year.

In order to implement the one-child policy, many local government officials caused a lot of pregnant women to die. In 2009, in Liaocheng, Shandong province, a 9-month pregnant woman was forced to do abortion by local cadres. She and her baby died. In Liuyang city, Hunan province, there was same case of forced abortion, in that both mother and her baby died. In 2012, in Shaanxi province, Feng Jianmei, a 7-month pregnant woman, was unable to pay a fine of 10,000 Yuan. She was forced to do abortion. At last, her baby died besides the mother (3 November, *Ming Po*). These were tremendous inhuman cases.

For the last 35 years, the CPC implemented one-child policy which sacrificed the happiness and lives of many people. Now, in terms of enhancement of labor force, fulfillment of production needs, lessening burden of aging problem, people are allowed to have one more child. The State Council has approved the new policy. People cannot decide how many children they can have. Yet, the people still have no reproductive rights which are deprived by the state. This is another example of the autocratic policies of the CPC.

In summary, there are many barriers ahead of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document. Most of the ideals cannot be achieved. The improved measures are better than none, but they cannot meet people's desperate needs for livelihood and democracy.

29 November 2015

Hong Kong:

- 2 Fight for Universal Retirement Protection Scheme, Reject the False Official Proposal.....Zheng Yan
- 3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Significance of the Local District Elections.....Jun Xing
- 4 How Not To Take the Old Path?.....Da Jing
- 5 Cancel The Territory-wide System Assessment (TSA), Let Children Happily Grow Up..... Juan Di
- 6 Comments on the Ideas of “the Supremacy of the Chief Executive” and “Not Yet Decolonization”... Wei Bo
- 7 Metropolitan.....Chan Chong Hei
- 8 Violence with Tenderness is Most Horrible (reprint).....Chan Tak Cheung

China

- 9 Release Immediately Pu Zhiqiang and All Innocent Imprisoned Dissidents!.....Zhang Kai
- 10 Comments on the 13th Five-Year Plan on National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Zhang Kai
- 13 Special Feature on “Wu Gan, the Super Vulgar Butcher”.....Lau Shan Ching
- 18 Don’t Forget Einstein’s Warnings.....Po Mi
- 21 China’s Climate Nightmare: the Top One Country of Manufacturing Climate Change Suffers the Evils of Pollution.....Resistance

International

- 23 Statement on UkraineThe Fourth International
- 25 The Making of Neoliberal Mexico.....Edgard Sanchez
- 29 What’s Left in Africa? Reflections on the Failure of Left, Working Class Movements to Take Root in Most of Africa.....Firoze Manji
- 31 Making the World Safe for Big Business..... Sean Starrs
- 35 Swiss leaks / HSBC: Drug and Bank Lords.....Éric Toussaint

Memorial

- 38 In memorial of comrade Chen DaotongXiong Andong

Theory

- 39 Where is the Stalin bureaucracy leading the USSR?.....Leon Trotsky
- 45 How Revolutionaries are Formed.....Leon Trotsky
- 48 Intellectuals and the Party Milieu.....Leon Trotsky
- 49 Discussions with Trotsky II: Defense Organization and Attitude Toward Intellectuals.....Leon Trotsky

Article in English

- 52 Release Immediately Pu Zhiqiang and All Innocent Imprisoned Dissidents!.....Zhang Kai
- 53 Comments on the 13th Five-Year Plan on National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Zhang Kai

十月評論

October Review

第42卷第2/3期 (總第239期)

2015年12月31日出版

香港	2 爭取全民退休保障，反對當局以假塞責！.....振言
	3 區議會選舉的特點和啟示.....軍行
	4 怎樣不走老路.....大進
	5 應立即取消小三全港性系統評估，讓學童健康快樂地成長！.....涓滴
	6 評「特首超然地位」和「未去殖民化」論調.....微波
	7 國際大都會.....陳中禧
	8 看似溫柔的暴力最可怕(轉載).....陳德章
中國	9 立即無條件釋放浦志強和所有無辜陷獄人士！.....張開
	10 關於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規劃的評論.....張開
	13 “超級低俗屠夫”吳淦特輯.....劉山青輯撰
	18 不忘愛因斯坦的告誡.....破謎
	21 中國氣候惡夢：氣候變化的最大製造國正自食污染惡果.....抵抗
國際	23 關於烏克蘭問題的聲明.....第四國際
	25 墨西哥新自由主義的炮製.....埃特加·桑切斯
	29 非洲還剩什麼？反思紮根於非洲大陸的左翼勞動階級運動的失敗... 法羅則·曼吉
	31 貿易問題：為大公司使得世界更安全.....肖恩·斯塔爾
	35 瑞士解密：滙豐、毒品和銀行大亨.....埃理克·杜桑
懷念	38 祭陳道同.....熊安東
理論	39 斯大林官僚層把蘇聯帶往何處去？.....托洛茨基
	45 革命者是如何形成的？.....托洛茨基
	48 知識份子和黨的環境.....托洛茨基
	49 訪托洛茨基 II：防衛組織和對待知識份子的態度.....托洛茨基
英譯	52 Release Immediately Pu Zhiqiang and All Innocent Imprisoned Dissidents!.....Zhang Kai
	53 Comments on the 13th Five-Year Plan on National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Zhang Kai